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Aperiodic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285期

目录

【专稿】

单少杰 “妄议”现时中国国际境遇（展望续）
——简述百年来民主制国家与集权制国家对峙史

【研究】

陈永迪 成都军区“四大”始末

【评论】

方延曦 杀俘虏，壮胆气——新兵蛋子的第一课

【域外见闻】

于向真 我眼中的新加坡（2）
——小坡的移民与疫情

【述往】

安希孟 北师大文革变奏曲

1. 造大庆展览的反
2. “海派”由来
3. 吻你——我们和“苏修男特嫌”过招
4. 没有右派的社会
5. 我在银川搞摆拍
6. 思想总结

【文摘】

张显扬 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从恶性循环到良性互动
——兼论毛泽东的皇权主义世界观

【读者来信】

1. 梁幼志：希望看到更多的高校文革资料选
2. 刘进、蒋健、何蜀、张晓良纠错

【本刊声明】

【专稿】

“妄议”现时中国国际境遇（展望续）

——简述百年来民主制国家与集权制国家对峙史

单少杰

五、展望（中）

既然美国方面已如此看待中国，即把中国确认为那种正在快速崛起且越发专制的集权制国家，故也是那种现在就应予以防范或予以围堵的集权制国家；那么，中国方面又是如何自我表现的，是自我表现得并非像美国方面所确认的那种集权制国家，还是自我表现得正如同美国方面所确认的那种集权制国家，那种正在招致许多民主制国家予以猜忌乃至予以敌视的集权制国家？

平心而论，若就近一些年（即自中共 18 大召开后这些年）来看，中国方面也的确自我表现得越来越趋于集权，即在经济、政治以及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自我表现得越来越趋于集权，并因此而越来越招致诸多民主制国家予以猜忌乃至予以敌视；同时还自我表现得越来越趋于张扬，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已在诸多方面越来越趋于集权，并因此而越来越招致诸多民主制国家予以防范乃至予以围堵。

若是从集权与分权关系（或说从权力集中与权力分拆关系）的维度来看，自 1978 年至今的当代中国改革史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 1978 年“真理标准”讨论至 1989 年“六四事件”爆发，其总体发展趋势呈现为全面分权，即这个国家的各个领域，如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以及思想文化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处于由集权到分权的过程中，或说是都处于由紧捆手脚到逐渐松绑的过程中。

第二阶段自 1989 年“六四”事件爆发至 2012 年中共十八大召开，其总体发展趋势则开始出现分化，即分化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取向：其经济领域在经历了两年多停滞期（即 1989 至 1992 年）后，再次处于由集权到分权的过程中，并且是以更为开放且更为迅猛的方式处于这一过程中的；其政治领域以及思想文化领域则发生逆转，不再处于由集权到分权的过程中，反倒处于由分权

到集权的过程中。

第三阶段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至笔者撰写此文时，也就是正处在所谓“某某新时代”，其总体发展趋势则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为全面集权，即这个国家的各个领域的发展取向又由分化归于一统，即一统在由分权走向集权的过程中：不仅其政治领域以及思想文化领域继续处于由分权走向集权的过程中，并呈越发加速且加强之势；而且其经济领域也转而处于由分权走向集权的过程中，如要做强做大国有经济，如要加强执政党及其总书记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掌控权。

上述可见，当代中国改革迄今为止的历程很像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程：最先由分权否定集权（1978—1989），在经历了一个既有否定集权取向又有否定分权取向的过渡阶段（1989—2012）后，最终又由集权否定分权（2012至今）。这也就意味着，此时中国改革正在走向终结，至少是正在走向某个历史阶段的终结。

自1978至1989年，整个中国大陆都进入到改革的过程中，或说是都进入到“分权”——即对这个国家此前过于集中的权力进行拆分——的过程中。当然，这种“分权”式改革不是均衡的，而是非均衡的，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表现。

在经济领域，这种“分权”式改革表现得最显实效，即拆分出了各种充满活力的非公有制经济：一是拆分出了许多个体经济，其间既包括许多承包农村土地经营的个体经济，也包括许多从事城市服务行业的个体经济；二是拆分出了许多民营经济，其间既包括许多产自本土的民营经济，也包括许多引自境外的民营经济；三是拆分出了许多合资经济，其间既包括许多公私合资经济，也包括许多中外合资经济。

中国经济改革最初就是从农村中的“包产到户”搞起来的，而“包产到户”的实质就是要搞“分权”，就是要将农村土地的集体经营权拆分为个体经营权，也就是“分田单干”。

因此，所谓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将农村中既有的所谓“社会主义经济”，即“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集体经济，分权于隶属每个农民家庭的个体经济，也就是“包产到户”。

同理，所谓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将城市中既有的所谓“社会主义经济”，即各种国有经济和各种集体经济，分权于所谓“非社会主义经济”，即各种个体经济和各种民营经济；并且，还要对仍隶属“社会主义经济”范畴的国有企业进行改革。而这一改革的实质仍是要进行分权，即分权于所谓“双轨制”：使其一部分仍按计划轨道进行生产与交换，使其另一部分则按市场轨道进行生产与交换。

在政治领域，这种“分权”式改革则表现得最为曲折，往往是走两步退一步，如在1983年退而反所谓“精神污染”，如在1987年退而反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是走两步退五步，如在1989年竟然退而开枪镇压青年学生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政治改革仍在磕磕绊绊地向前推进着，并在1987年（中共13大召开后）至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前）间进入其最高潮阶段，即密集推出一系列大尺度的有关政治改革的设想与举措。如，在中央政府各部委中不设党组，在工矿、企业、学校等基层单位中不设党的专职队伍；又如，实行党务公开、政务公开、财务公开，直接选举村、乡、县、市干部；又如，必须发挥各种社会组织作用，实行村民自治、工人自治（加强工会监督作用）。¹

而这一系列大尺度的有关政治改革的设想与举措说到底仍是要“分权”，即要分减执政党在政治领域所拥有的那种垄断一切的控制权。正如赵紫阳所言：“在我们这个国家搞政治改革的实质，就是要改变执政党领导一切、包揽一切、垄断一切的状况，就是要削弱执政党对整个国家的控制权”。²

在思想文化领域，这种“分权”式的改革表现得最为活跃，几乎可以说什么样的思想都可以表达，什么样的观点都可以讨论。在中共建制七十年来的思想监控史中，就数这一时期最为宽松，既比此前三十年宽松得多，也比此后三十年特别是最近几年宽松得多。

仅就哲学领域来看，不仅大量引进各种外来思潮，如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马克思主义、语言分析哲学、逻辑实证主义、波普尔学说、弗洛伊德学说、萨特存在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等等；还不断发起各种文化讨论，

¹ 引自笔者访谈：《宗凤鸣先生谈赵紫阳思想》，载拙著：《中国改革模式——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香港：天地出版社2014年版，第516-517页。

² 引自：同上，第515-516页。

如有关“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讨论、有关“黄色文明”（保守）与“蓝色文明”（开放）的讨论、有关“丑陋中国人”与“国民性改造”的讨论，等等。

而这种“宽松”说到底仍是要“分权”，即要分减执政党在思想文化领域所拥有的那种唯我独尊的话语权，那种打压一切不同意见的话语权，也就是那种要对其治下民众大搞愚昧主义的话语权。

自1989至2012年，中国改革发生分化：其经济改革在1992年后又再次启动，再次进入由集权到分权的过程中；其政治改革自1989年后就不再前行，不再处于由集权到分权的过程中，甚至在一些方面发生倒退，反倒处在由分权到集权的过程中。

在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再次走上改革之路，再次走上前领导人赵紫阳曾坚持要走的“渐进”式的改革之路，也可说是“渐进”式的分权之路。

这种“渐进”式的改革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主要的方面，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逐步生长、壮大一种新的经济，即市场经济”（笔者按：这个方面的改革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增量改革”）；“另一个方面，就是对计划体制内的那一部分，也逐渐地加以削弱缩小”；“总之，……我们一方面扩大计划外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逐步缩小计划经济的比重”。¹

赵紫阳还特别强调：“在两种体制并存的情况下，只能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逐步扩大市场调节这一部分；逐步缩小计划经济这一部分，而且是一部分一部分地缩小，一块一块、一批一批地缩小”。²

这种“渐进”式的改革，特别是其中的“增量改革”，也可以说是一种“渐进”式的“分权”，即“渐进”式地将既有的中国经济，也就是既有的高度集权于政府计划的中国经济，“分权”于两种有着不同发展趋势和不同运行规则的经济，即逐步缩小的按政府计划运行的经济和逐步扩大的按市场规律运行的经济。

这种“分权”性的改革在1992年后获得了巨大的进展：

¹ 引自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140页；参见宗凤鸣：《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香港：开放出版社2007年7月板，第76-77、88、174页。

² 引自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48页。

一方面，更为迅猛地“扩大计划外的市场经济”，其间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既大力催生许多产自本土的民营企业，又大力引进许多来自海外的民营企业，或是来自香港和台湾的民营企业，或是来自韩国和日本的民营企业，或是来自欧洲和北美的民营企业，其中包括许多超大型跨国企业；

另一方面，又更为显著地“缩小计划经济的比重”，比如通过采取“抓大放小”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将许多原先是由中小型国有企业经营的领域都开放给非国有企业去经营，以至于除了金融、电信、能源、铁路、航空等少数行业外，这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行业都已由民营企业来经营了。

在政治领域里，执政党自1989年后就不再搞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或说是不再走中共十三大所开启的那条政治改革之路，那条旨在削弱“执政党对整个国家的控制权”（即“分权”）的政治改革之路，反倒要强化“执政党对整个国家的控制权”（即“集权”）。

先是江泽民在主政时特别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即为了维护其政治“稳定”而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包括可以采取一切“违宪”的手段，比如公然实行有违公民基本人权的“报禁”政策与“党禁”政策；同时在意识形态上急剧“左”转，既重弹“反和平演变”的老调子，又炒作“问姓社姓资”的新话题，竟使得邓小平都看不下去，不得不通过发表“南巡讲话”来予以打压。

继是胡锦涛在主政时又特别强调“党的执政能力”，按赵紫阳解读，“就是要加强一党专政的统治能力，一切都是为了保持党的专政地位不能动摇，无论谁触犯这一条都绝对不允许”；同时在意识形态上更趋保守，如赵紫阳所言，“他上任后，首先去西柏坡，后又去延安，还去毛主席家乡”，以表明他“要继承毛主席这个传统”。¹

接下来的问题是，只搞经济改革而不搞政治改革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曾亲身领导过这两大改革的赵紫阳已给出明确答案：“首先腐败问题就解决不了，结果只能是经济越发展，腐败越严重”。²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现时中国经济获得了中共建国以来乃至中国有史以来最为蓬勃的发展；另一方面，现时中国贪腐也获得了中共建国以来

¹ 引自宗凤鸣：《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第381-384页。

² 引自笔者访谈：《宗凤鸣先生谈赵紫阳思想》，载拙著：《中国改革模式——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第514页。

乃至中国有史以来最为猖獗的滋长。经济与贪腐齐飞，官员与黑金一色。

不过，这一日益严重的贪腐形势也为日后的主政者提供了某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政治机遇，即为他提供了可以借整肃官员腐败来进行个人集权的政治机遇。

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以来，当代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个被中国官方大加称颂的“某某新时代”，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几乎所有领域都处在由分权趋于集权的过程中。

例如，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继续处在由分权趋于集权的过程中，并呈日益加速且加剧之势，以至于在许多方面又回到改革前的状况。

又如，经济领域也开始处在由分权趋于集权的过程中，并因此而重创已长时间（三十余年）经历由集权趋于分权过程（即市场化过程）的中国经济，致使其开始进入持续下行的轨道，或有可能缓慢地持续下行，或有可能急剧地持续下行。¹

至此，当代中国改革已相继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全面趋于分权，即几乎所有领域都处在由集权趋于分权的过程中；第二阶段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既有分权又有集权，即部分领域继续趋于分权和部分领域开始趋于集权；第三阶段的主要特征则表现为全面趋于集权，即几乎所有领域都处在由分权趋于集权的过程中，故也是都处在事实上是要终结中国改革的过程中。

这第三阶段的主要特征在经济领域里的突出表现，就是重国有经济而轻民营经济，就是尽可能地将各种资源，包括民营经济已创造或已拥有的一部分资源，向国有经济集中。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任执政党领导人中，就数现时执政党领导人最为看重以国有经济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同时也最为提防以民营经济为代表的私有制经济，从而不忘执政党原本就怀有的那种“初心”，那种最初刊布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初心”，即要消灭私有制而建立公有制的“初心”（亦可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

正是基于这种“初心”，现时执政党领导人极为看重国有企业，将之视为

¹ 在此前一篇拙文中，笔者曾把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轨迹比作一条“抛物线”，并把其中自1978至2012年间的增长轨迹比作这条“抛物线”的“上行段”，也就是持续向上攀升段；而把自2012年以后的增长轨迹比作这条“抛物线”的“下行段”，也就是持续向下滑行段，其间或有可能缓慢地持续向下滑行，从而实现所谓“软着陆”，或有可能急剧地持续向下滑行，从而遭遇所谓“硬着陆”。——参见拙文：《V型、U型、L型或抛物线型——略谈中共十八大后的中国经济增长轨迹》，首发于2017年2月17日《博讯》网刊（Boxun.com）。

“党的执政基础”：即“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因而必须“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为此就要“坚持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的方针”，“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¹

可问题是，集近现代以来许多东西方国家所共有的一个施政经验，就是几乎所有国有企业都与低效率相伴而生，都是高投入低产出，不大可能仅凭自身之力就可以做得特别成功，比如同时兼而“做强做优做大”；而若硬要做到这一点，也就只能依靠国家方面给予特别扶持（即给“开小灶”或让“吃偏饭”），或是给予经营权限方面的特别扶持，或是给予资金供给方面的特别扶持。

所谓给予经营权限方面的特别扶持，主要是让国有企业，特别是能源领域和金融领域里的国有企业，能够享有垄断经营的权力，以使其产品能够轻易卖出超高的价格。例如国有“三桶油”（即中石油公司、中石化公司、中海油公司）卖给国内市场的燃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就远高于国际市场上的同类产品的价格，又如国有“四大行”（即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在国内市场所实行的存贷利差也远高于国际市场所通行的存贷利差；并因此而都能够轻松获取毋宁说是轻松攫取超额的利润，进而藉此跻身于世界五百强中的超强梯队，或是成为世界上最轻松获利的油气公司，或是成为世界上最轻松赚钱的银行。

所谓给予资金供给方面的特别扶持，主要是让国有企业，特别是那些关乎整个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即那些直接掌控诸如金融、能源、电力、电信、航空、航天、铁路、矿产、原材料、大型设备制造等关键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均由国有资产绝对控股并受中央政府直接节制，常被简称为“央企”），能够比非国有企业，特别是那些中小型民营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支持，或是更容易获得银行借贷方面的资金支持，或是更容易获得财政补贴方面的资金支持。

无庸讳言，上述由国家方面给予国有企业的特别扶持，属于很不合理的资源配置，不仅有损公正，而且有损效率。

这种资源配置是重国企而轻民生，是为“做强做优做大”国企而牺牲民生：

¹ 引自：《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党对国企的领导不动摇》，载新华社官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0/11/>）。

或是为了维护国企的垄断地位而牺牲民生，即让民企和民众购买更贵的国企产品，如更贵的电、更贵的电信、更贵的燃油和天然气，等等；或是为了满足国企的资金需求而牺牲民生，即让民企和民众交更多的税、付更高的利息，有时即便想付更高的利息也很难从银行里贷出款来。

这种资源配置自是会大幅提高国民经济的运行成本，而其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会大幅提高民营企业的经营成本。据知情者曹德旺先生披露：“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要比美国“高35%”，已是“全球最高”；“除了人力，美国各项生产成本都比中国便宜，土地基本不要钱，电价只有中国的二分之一，天然气价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运输成本也很低，一公里还不到一块人民币”；¹至于“中国劳动力已经没有突出优势了”，“现在也只是比美国便宜，跟周边国家比，一点竞争力都没有”。²

重国有经济的另一面便是轻民营经济。执政党不仅通过上述高征税和高电价、高油价等方式来挤压（毋宁说是榨取）民营企业，还通过其他一些方式来挤压民营企业。

如在资本运作上，执政党提出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可以相互参股，即国有资本可以参股民营企业，民营资本也可以参股国有企业。这一主张看似一碗水端平，即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均享有参股对方企业的平等权力；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国有资本背靠国家机器，享有民营资本无法享有的国家保护，若无利益冲突则罢，若有利益冲突则前者便会碾压后者。这就有些类似执政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搞过的那一套：先是搞“公私合营”，继是搞“公家独营”。

如在企业建构上，执政党执意要在民营企业中建立党组织，也就是要在资本家所拥有的企业中建立共产党所领导的组织，或为党小组建制，或为党支部建制；并开展党组织活动，即开展那种不是听命于企业老板的党组织活动，或说是那种虽鼓捣于企业老板的卧榻边却听命于他人的组织活动。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组织部门的指导下，民营企业不断推进‘两个覆盖’，即党的组织覆盖和党的工作覆盖”：“截至

¹ 引自第一财经：《制造业回流美国考谱吗？在美投资10亿美元的曹德旺这样说》，载第一财经官网（<http://www.yicai.com>）：新闻>>第一财经·要闻 2016-12-19 16:48。

² 引自公司秘闻（ID: high3c）：《曹德旺：难道我一定要把形势说得一派大好，大家才开心？》，载新浪微博（<http://weibo.com>）：财经网官方微博 2016-12-20 23:38。

2018年12月31日，全国有158.5万家非公有制企业法人单位建立了党组织”；“民营企业党建工作越来越多地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已成为党的建设工作和民营企业的一份骄傲。”¹

如在舆论宣传上，执政党大讲不忘“初心”；而要谈及执政党的“初心”，就不能不追溯到所有共产党都奉为“原教旨”的《共产党宣言》。该宣言声称，“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²；而“共产党人”所要“消灭”的“私有制”，便是现时中国民营企业正在实行的所有制！这就不免让现时中国民营企业企业家细思而恐极，倒吸一口凉气，吓出一身冷汗。

甚至有“资深金融人士”放出这样一些话：在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私营经济已经初步完成了协助公有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阶段性历史重任。下一步，私营经济不宜继续盲目扩大，一种全新形态、更加集中、更加团结、更加规模化的公私混合制经济，将可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新发展中，呈现越来越大的比重。³

显然，这些话颇合时宜，即呼应了执政党此时正屡屡高调标榜的不忘“初心”的誓言，而此“初心”就包含了敌视乃至消灭私有制的夙愿。

另外，这些话也似曾相识，即似曾相识于执政党过往屡屡过河拆桥的那些往事，比如似曾相识的执政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对待民营企业家的那些往事：先是恭请他们积极参加“战后经济恢复”，继又强使他们积极参加“公私合营”，并在用完后便打发他们走人。

如此挤压民营企业的最直接且最有害的后果，就是严重打击了民营企业家的投资信心，使得他们因担心执政党又要搞过河拆桥而缩手缩脚起来，不敢再像先前（即“某某某新时代”前的“江湖时期”）那样无所顾忌地扩大经营了，而不得不歧路彷徨：或放缓步伐，边走边看；或驻足不前，四下张望；或干脆跑路走人，不是将其资金外流，就是将其企业外迁。

据中国官方数据：国家外汇储备在2014年末至2015年末间，减少5127亿美元；在2015年末至2016年末间，又减少3198亿美元；两年累计减少8325

¹ 引自闫妍、段晨茜：《中国的民营企业为什么要加强党的建设？》，载人民网2019年10月15日政治栏（<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1015/>）。

²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³ 引自吴小平网文：《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退场》；参见顾志娟：《建议“私营经济退出”，称“2018A股大牛市”，吴小平是谁？》，载新京报网络版2018年9月12日财经栏（<http://www.bjnews.com.cn/finance/2018/09/12/>）。

亿美元，平均每天减少 11.4 亿美元。¹显然，在这 8325 亿美元中，就有很很大一部分是由民营企业外流出去的。

又据曹德旺先生披露：由于企业税负过重和生产成本过高，“现在很多好的企业搬到欧美去了”，如福耀公司一部分新厂房就建到美国去了。而“中小企业呢，有的搬到越南，有的搬到柬埔寨”。²显然，这搬出去的“好的企业”和“中小企业”大多是民营企业。

可现如今，中国民营经济在整个中国经济构成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透露：截至 2017 年底，我国民营企业超过 2700 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 6500 万户，总注册资本超过 165 万亿元，总 GDP 占比超过 60%，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并且，我国 65% 的专利、75% 的技术创新、80% 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民营企业完成的。尤为突出的是，民营经济对城镇就业的贡献率超过 80%，其中对城镇新增就业的贡献率超过 90%。³

稍有常识者都会明白，民营经济强则中国经济强，民营经济弱则中国经济弱。可是，某些执政党领导人竟不清楚这一常识，执意推行那种旨在重国营经济而轻民营经济的政策，以至于挤压了后者的发展空间乃至生存空间，并因此重创了中国经济，致使中国的 GDP、就业率和政府税收等一系列关键性数据都呈快速下行的趋势。

至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就更是全面趋于集权了，不仅更是全面集权于执政党，还更是全面集权于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

所谓更是全面集权于执政党，就是进一步强化执政党对于这个国家的全面管控权，就是要把“一党专政”的事做得非常彻底。

例如，执政党进一步强化其自身对于其治下司法系统的管控权，决意要让所有司法部门都必须服从执政党的绝对领导，都必须成为执政党的统治工具，并为此而坚决反对“司法独立”这一法治理念，这一为所有文明国家都遵奉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法治理念。同时，执政党还严厉打压那些决意要进行上诉的维权活动，还严厉打压那些决意要为前者做出辩护的“死磕律师”，甚至不惜将

¹ 引自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官网(<http://www.safe.gov.cn/>): 统计数据>>统计数据列表>>外汇储备数据>>国家外汇储备规模>>2014—2016 年中国外汇储备数据。

² 引自公司秘闻 (ID: high3c): 《曹德旺: 难道我一定要把形势说得一派大好, 大家才开心?》, 载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 财经网官方微博 2016-12-20 23:38。

³ 引自: 《发改委: 民营经济占 GDP 比重超 60% 撑起我国经济“半壁江山”》, 载手机人民网/财经>财经要闻 (原创稿) /2018-09-06/ (<http://m.people.cn/n4/2018/0906/>)。

其中最坚决者予以拘禁乃至判以重刑，故而使得“某某新时代”成了中国维权运动遭遇最严管控的时代。

又如，执政党还进一步强化其自身对于其治下各个社区的管控权，为此而几乎不受限制地使用各种监控手段：或是到处安插四下打探的“西城大妈”和“朝阳群众”，以将某些居民的一言一行都置于安全部门的监控之下；或是到处安装几无死角的天眼监控系统 and 人脸识别系统，以将所有行人的一举一动都置于安保人员的窥视之下。

又如，执政党还进一步强化其自身对于其治下各种传媒的管控权，明令所有出版物都不得刊载有关执政党及其领导人的负面报道，比如不得刊载有关“大跃进”运动饿死数千万人的负面报道，比如不得刊载有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祸害数万万人的负面报道，甚至为此而非常霸道地劫夺了“不听招呼”的《炎黄春秋》杂志，不管不顾地拔掉了中国大陆文史类期刊界的最后一个敢讲真话的“钉子户”。

特别是近年来，执政党还进一步强化其自身对于其治下互联网的管控权，只许上传有利于官方的资讯而不许上传不利于官方的资讯。一方面大量雇佣那种寡廉鲜耻的“五毛”水军，或使之群起而点赞那些拍马奉迎之作，或使之群起而攻讦那些直言骨鲠之作；另一方面又精心打造各种功能强大的删贴软件，专删那些带有某类“敏感词”的网络文章，并因此而逼得那些既想直抒己见又不想被迅即封杀的“有才网民”创造出了一种新文体，一种错别字接二连三且怪异莫名，但寓意一目了然且妙趣横生的新文体。

.....

上述种种进一步强化执政党管控权的举措，似乎都在印证前文已引述的彭斯所曾给予的指责：在“让自己的人民迈向更大的自由”方面，中国当局正发生急剧变化，即朝着更加集权的方向“急转弯”。

所谓更是全面集权于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就是进一步强化执政党最高领导人对于这个党以及这个国家的绝对领导权，就是在把“一党专政”的事做得非常彻底的基础上，又把“一人专党”乃至“一人专国”的事做得非常彻底。也就是做出了先主席毛泽东已做过的那种事，那种曾在一段时间里（即1958至1962年间）将党务大权、军务大权以及政务大权（主要是国务院大权）都统统

集于其一身的事。

自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及其国家的顶层权力架构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其间也包括三个不同阶段，即完全分权阶段与部分分权且部分集权阶段以及完全集权阶段。

第一阶段，自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至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即胡耀邦与赵紫阳先后主政时期。在此阶段，执政党及其国家的顶层权力架构处于一种近乎完全分权的状态，其间四大权力职务分别由不同的人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先后由胡耀邦和赵紫阳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则一直由邓小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职务先后由李先念和杨尚昆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职务先后由赵紫阳和李鹏担任。

第二阶段，自1989年6月至2012年10月（中共十八大），即江泽民与胡锦涛先后主政时期。在此阶段，执政党及其国家的顶层权力架构处于一种过渡的状态，一种介于完全分权与完全集权之间的状态：一方面已不再处于完全分权的状态，因为四大权力职务中的三者，即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国国家主席，都由一人担任，即先后由江泽民和胡锦涛担任；另一方面又仍未能处于完全集权的状态，因为四大权力职务中的另一者，即中国国务院总理，不仅仍先后由朱镕基和温家宝担任，而且仍先后由他们行使其实权。

从政治改革角度看，执政党顶层权力架构从由某一个人专权过渡到由诸多个人分担，应是一种进步，一种旨在超越个人专权的进步；反之，则是一种倒退，一种试图回归旧时体制的倒退。

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兼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这就意味着此时的执政党顶层权力架构已倒退至1976年前的状态，即毛泽东一人而兼任两大顶层职务，即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1993年3月（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及军委主席江泽民又兼任中国国家主席。这又意味着此时的执政党顶层权力架构又倒退至1959年前的状态，即毛泽东一人而兼任三大顶层职务，即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以及中国国家主席。

第三阶段，自2012年10月至今，即被执政当局高调自封为“习近平新时代”。在此阶段，执政党及其国家的顶层权力架构则已近乎处于一种完全集权

的状态：不仅四大权力职务中的三者，即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国国家主席，都由习近平一人担任；而且四大权力职务中的另一者，即中国国务院总理，虽其名义仍由“法理总理”李克强担任，但其实权已在很大程度上落入“小组长专业户”习近平手中。

自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相继担任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等等。他也因此不仅被国人戏称为“小组长专业户”，还被外媒戏称为“万能主席”（Chairman of Everything），即掌控一切的主席。

在这许多小组中，有一些小组的职能与国务院的职能是重合的，即前者试图要干的事原本就是后者一直在干的事。鉴于这些小组的组长均为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或说是国务院的上级领导人，并且其本人就抱有要将自己“定于一尊”的强烈意愿；故可以说，他这是要越过国务院而直接管起国务院曾直接管起的许多事务，或说是要取代国务院而直接行使国务院曾直接行使的许多事权。这意味着，他要否定“党政分开”而再搞“以党代政”，或说是要开政治改革的倒车。

在此之前，无论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都未曾像习近平这样当过许多小组的组长，因而也都未曾过于强势地染指国务院的事权。与此相应，无论是朱镕基还是温家宝，也都未曾像李克强那样受到来自总书记的强烈挤压，因而也都能够较为独立地掌控国务院的事权。

比较而言，无论是江泽民当总书记的时期还是胡锦涛当总书记的时期，都可以说是总书记与总理“联袂施政”的时期；至于习近平当总书记的时期，则只能说是总书记“独领风骚”的时期。

还需指出，现时执政党最高领导人如此集权，即把包括国务院大权在内的各种大权都集中于其一人，早有先例，不过是在重做先主席毛泽东曾做过的事，即此公曾在1958至1962年间做过的事。

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严词批评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一干国务院大员，指责他们犯了“反冒进”的严重错误，并

藉此将他们所执掌的诸多大权，尤其是财经工作的诸多大权，集中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也就是集中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那里。

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强使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等人在大会上发言，向中共八大全体代表进而向中共全党同志作“深刻检讨”：一方面无底线地贬损自己有多么错误，讲了许多自责乃至自辱的话，另一方面又无上限地称颂主席有多么正确，讲了许多恭维乃至肉麻的话。¹

1958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宣布这些新成立的小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1959年4月，毛泽东又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重申：“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²

于是，毛泽东通过打压周恩来等人和成立许多小组，并在邓小平协助下，最终将原属于国务院的诸多大权集中到自己手中，接着便兴冲冲地跑上前台，亲自挂帅主抓经济工作，主抓本应由国务院主抓的经济工作。可是，就实际结果看，如此集权实属闯祸，闯出“大跃进”之祸，竟在好端端的年景里活生生地饿死了数千万人。

权力应与责任相匹配，若要掌控什么样的权力，就应负起什么样的责任。毛泽东既然掌控执政党的一切党政大权，就应负起执政党的一切领导责任，至少应负起执政党搞“大跃进”的一切领导责任。也正因此，毛泽东不得不在“七千人大会”上低头认错：“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的，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³

无庸讳言，中共十八大后的习近平与南宁会议后的毛泽东还是颇有些相似的：不仅都很急切地集中起各种大权，其中就包括一些原本是由国务院直接掌控的大权；还都很急切地成立了许多小组，其中就包括一些能代行国务院原有职权的小组。

那么，他们两人如此集权的后果是否也颇为相似呢？那位在先者如此集权

¹ 笔者曾就毛泽东严厉批评周恩来等人搞“反冒进”事作过相关解读。——参见拙著：《毛泽东执政春秋》第16节，香港：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133页。

² 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³ 笔者曾就毛泽东这一低头认错事也作过相关解读。——参见拙著：《毛泽东执政春秋》第16节，第230—239页。

的后果，我们已经看得清清楚楚；那位在后者如此集权的后果，我们也能看出个大概来，似乎也不太乐观。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现时执政党领导人不只是要把各种大权都集中于其一身，还试图要把已经集中于其一生的某些权力持续地保有下去，即取消对他执掌这些权力的任期限制，极而言之，也就是要搞那种带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权力终身制。

并且，执政党已经付诸实践，走出了关键性一步，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18年3月），取消了对国家主席一职的任期限制，即删去有关中国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法律规定。这也就意味着，现任国家主席在做完两届后还可以不受限制地做下去，即便想终身地做下去，也不会遭遇法理上的困扰。

无庸讳言，如此修改宪法实属开历史倒车，也就是开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倒车，也就是要否定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的最为重要的历史成果。

在邓小平谈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所有文献中，世所公认最有价值的一篇文章，要数他在1980年8月18日所作的一篇讲话；而在邓小平所作的这篇讲话中，世所公认最有价值的一段文字，则要数他在该文第三节中所作的一段论述，一段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论述，一段强调“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论述。¹

从文本字面来看，这一段论述在这整篇讲话中并不突出：一是所处位置并不突出，只作为五大相关改革之一，并只排序第四；二是所占篇幅并不突出，只有二百余字，仅为全文篇幅的三十分之一。可是，从实际意义来看，这一段论述在这整篇讲话中则属于最有价值的一个部分，至少是最受后人肯定的一个部分。

那么，这段论述为何最有价值且最受后人肯定？在笔者看来，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是这段论述直接切中既有政治体制最为要害的一个问题，也是最难改革的一个问题，即有关执政党领导干部的任期问题。无庸讳言，许多执政党领导

¹ 引自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1-332页。

干部执掌权力就像吸食“海洛英”一样，在享受权力的同时也对权力产生了极为强烈的依赖感，总想尽可能长久地待在其权位上，并因此而反对任何旨在限制官员任期的制度安排。

二是这段论述曾已成中共高层共识，并已被他们付诸实践，故已获政治改革实效。自1980年邓小平作此论述到2018年习近平修改宪法近四十余年间，前后数届执政党领导人基本上都认同邓小平这一论述，其任期一般都不超过两届。邓小平本人亦如此，自1981年6月（中共11届6中全会）当选中央军委主席至1989年11月（中共13届5中全会）辞去中央军委主席，前后八年有余，任期不足两届。

六、展望（下）

如今，执政党及其领导人不只是大搞集权，还大肆张扬：一是大肆张扬自己就是要搞那种“集权制国家”，就是要搞那种“一党专政”加“个人专权”的“集权制国家”，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二是大肆张扬自己所执政的这个国家就是要做那种咄咄逼人的“崛起大国”，就是要做那种能“当头”的“崛起大国”，就是要做那种能叫板“守成大国”的“崛起大国”，就是要让天下人都知道其治下的这个国家是一个“厉害了我的国”！

其一，高调操办各种超大型国际会议。

执政党领导人很爱操办各种超大型国际会议，如“APC会议”、“二十国集团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会议”；并很爱在这些超大型国际会议上作各种炫耀性展示，或是炫耀性展示一处处非常奢华的礼宾场所，或是炫耀性展示一道道非常奢靡的精致菜肴，或是炫耀性展示一套套非常周密且非常殷勤的宫廷式服务。

显然，作如此炫耀性展示的用意是要借此提升东道主的形象，或是要借此提升中国的形象为“富强大国”的形象，或是要借此提升中国领导人的形象为“世界领袖”的形象。

不过，作如此炫耀性展示的效果则很可能会事与愿违，比如很可能会招致那些来自民主制国家的与会者，特别是那些来自老牌且发达的民主制国家的与会者，予以反感乃至轻蔑。因为，他们很自然地会依据民主制国家的施政逻辑

做出这样的推断：

——这个东道主国家作如此炫耀性展示的实质，就是在滥用其纳税人的钱，即未经纳税人（或由纳税人选举出来的国会）的同意便动用他们的大量税款，去开这种过于奢华的超大型国际会议，这种形式远大于内容、领导人面子远重于老百姓实惠的超豪华国际会议。

——这个东道主国家之所以能作如此炫耀性展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现时中国所实行的国家制度不是民主制度而是集权制度，其领导人可以随其心意地统治其老百姓，比如无需纳税人（或由纳税人选举出来的国会）的同意便可以任意支配他们缴纳的税款；而其老百姓则不能颇为有效地制约其领导人，比如不能通过选票将这些既有违他们的意愿又有损他们的利益的领导人选下台去。

另外，他们还会清楚地知道，中国的国民并不富裕，其人均 GDP 较低，仅为发达国家人均 GDP 的几分之一，而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则更低，仅为发达国家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十几分之一；可是，中国的政府非常富有，不仅比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富有，还比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富有，一个最切近的例证就是能够开得起眼下这种超豪华的国际会议，这种连许多发达国家都开不起的超豪华的国际会议。¹

他们还会由此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之所以能搞出这种“民穷”而“国富”的双重景象，其根本原因仍在于制度，仍在于那种“民弱”而“国强”的集权制度。在此集权制度下，中央政府能够直接掌控其治下大部资源，并能够将其多数资源用于自己的各项开支，其中就包括用于召开这种超豪华的国际会议的开支，并以此来“显摆”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非常富贵且非常慷慨。

可见，执政者作如此炫耀性展示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让许多与会者，特别是那些来自民主制国家的与会者，更为感性且更为确定地认识到，这个东道主国家就是一个集权制国家，就是一个其执政者很少受到其老百姓制约的集权

¹ 这种“民穷”而“国富”的反差现象，就曾非常典型且非常不堪地显现于以下两个前后相继且反差极大的事件，或说是两个非常极端故而均可入史的事件：一是于 2016 年 8 月 26 日发生在中国西部甘肃省康乐县的一件极为悲痛的事件，一位母亲（杨改兰）迫于生活穷困而心意决绝地制造了史上最为惨烈的自戕性事件，先是亲手杀害自己的四个孩子（三女一男），继而服毒自尽，9 月 4 日，其丈夫（李克英）在安葬完五个亲人后，也随即服毒自尽。二是于 2016 年 9 月 4 日至 5 日发生在中国东部浙江省杭州市的一件极为奢华的事件，中国政府自恃财大气粗而一掷万金地举办了史上最为昂贵的 G20 峰会（即第十一次 20 国集团峰会），先是腾空了半个杭州城，继而在西湖边大宴宾客，灯红酒绿，觥筹交错，还伴以歌舞，甚至还别出心裁且有可能伤及舞者安全地伴以那幕光怪陆离的“水中芭蕾”。

制国家；因而也是一个“非我族内”的集权制国家，一个现在就必须予以防范乃至予以围堵的集权制国家。

不过，这个东道主未必能认识到这一点，未必能认识到自己用大把金钱加百般殷勤来好生伺候的这帮客人究竟是怎么想的，反倒有可能颇为自鸣得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觉着这么做挺好，挺有面子，至少是挺有所谓的“大国元首”的面子。

1979年，撒切尔夫人乘专机出席东京七国首脑会议，在莫斯科机场补充油料时受到了苏联总理柯西金盛情款待，享受了一顿“出乎我意料”的丰盛晚宴。可是，撒切尔夫人对此并不领情，反倒给予了一通苛评，一通注定要记入史册的苛评：“在苏联，对重要访客一向极大方。那里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国外权贵和党内精英的，穷奢极欲；另一个是一般百姓的，只有最普通的物品，而且还常常不够”。¹

如今，中国领导人似乎尤其偏好以竭尽奢华的方式来盛情款待各国领导人，其中就包括许多像撒切尔夫人那样的来自高度发达的民主制国家的领导人，因而也就很难避免将会遭遇前苏联领导人曾遭遇过的那种尴尬，那种竟会用自己的过度殷勤去博得对方的深度鄙视的尴尬，那种还会因此而被对方以非常否定的笔法写入其回忆录的尴尬。

其二，高调处理中国与不发达国家关系。

邓小平曾告诫其党人：“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²

邓小平力主中国不当头，主要是不当“第三世界国家”的头，也就是不当那些“不发达国家”或“穷国”的头；说得更直白些，就是不当那个“国际丐帮”的帮主，不做那个既跌份又赔钱的冤大头。

邓小平之所以作此告诫，主要是吸取了毛泽东的教训。

七十年代，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概念”，将整个世界一分为三：第一世

¹ 引自玛格丽特·撒切尔：《撒切尔夫人回忆录》（中译本），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² 引自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页。

界仅有美国与苏联，均为超级大国；第三世界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许多不发达国家，大都分布在亚、非、拉地区；第二世界则是处在上述两个世界之间的那些国家，其中既有一些国家追随美国，加入西方国家阵营，也有一些国家追随苏联，加入东方国家阵营。

与此相应，毛泽东还提出“三个世界战略”，即中国要积极引领第三世界中的多数国家，并尽量团结第二世界中的部分国家，来反对第一世界中的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其中的苏联。而这实际上是要让一个自身仍有数万万国民连饭都吃不饱的大穷棒子国家，领着一帮形形色色的小穷棒子国家，去叫板那两个最有钱有势的大财主国家。

显然，这一战略不过是毛泽东要把自己在国内玩得似乎很成功的那套老把戏，那套鼓动一帮穷棒子去“打土豪分田地”的老把戏（发动贫农并团结中农去孤立和打击地主和富农），拿到国际上再玩一遍，再鼓捣一帮穷棒子国家去叫板那些大财主国家，也就是变“穷人闹富人革命”为“穷国闹富国革命”，并试图从中谋求一些好处。

不过，毛泽东在国际上再玩他的那套老把戏就玩得很不灵光了，不仅没有能打着土豪，没有能分着土豪家里的大片良田，反倒要分了自己家里的那片薄地，反倒要拿出自己家里的许多穷家当，来接济跟在自己身后的许多小穷棒子国家。长此以往，便大量消耗了原本就不富裕的中国国家资源，使得这个大穷棒子国家变得穷上加穷。

如今，执政党领导人显然已不再重视邓小平的上述告诫，或说是已不再记取毛泽东的上述教训，而在国际交往中越来越想“当头”，尤其是越来越想当许多“穷国”的头，或说是越来越想做那个“国际丐帮”的帮主，并借以叫板那些富国，特别是那些已实行民主制的富国，也就是那些常常批评中国有不良人权纪录的富国。

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他们在国际交往中很爱“拉圈子”（或“拉群”），尤其很爱拉那种多数成员多为穷国的圈子，因而也是那种多数成员都爱说富国坏话的圈子。

比如这些穷国都爱说富国多有原罪，或曾大肆掠夺过许多殖民地，并因此导致这些地区长期陷于贫困；或曾过度开发过许多自然资源，并因此导致地球

生态严重恶化，使得全球气候迅速变暖。

比如这些穷国爱说富国为富不仁，不爱援助穷国；并盛赞本圈“圈主”中国虽在人均GDP方面远不及那些富国，但在援助穷国方面远超过那些富国，既向穷国提供许多优惠贷款，又给穷国运来大量实用商品，甚至还帮穷国盖起很豪华的大房子，用于举办大型礼仪型活动。

其主要表现之二，就是他们在国际交往中还很爱“撒银子”或“撒币”（亦说“傻B”），尤其很爱向许多穷国大把大把地撒银子，很爱摆出一种为接济弱小而仗义疏财的“大哥”范儿。

例如，他们先是在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宣布：中方愿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继又在2019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中方愿以政府援助、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融资等方式，再次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支持。

另外，他们甚至还很爱向一些富国，一些非常富的富国，大把大把地撒银子，比如常把他们对这些富国的“国事访问”之旅搞成了“政府狂购”之旅，同时也把他们自己搞得很像是那种挥金如土的超大号“暴发户”，挥挥手便签下了要买数百亿美元所访国商品的订单，买“波音飞机”或“空客飞机”就如同是在买“LV包包”或“HERMES包包”，好一副“大哥大”且“不差钱”的派头。

显然，此时中国“当头”与此前中国“当头”已有很大差别。

此前情况是一个大穷棒子国家要当许多小穷棒子国家的头，因而是穷帮穷，大穷帮小穷，其间免不了有许多打肿脸充胖子的事，也就是有许多为让其领导人脸面好看而让其老百姓勒紧裤带的事。

此时情况则是一个大暴发户国家（主要指中国政府俨然已成了一个腰缠万贯的大暴发户）要当许多小穷棒子国家的头，因而是阔帮穷，大阔帮小穷，其间免不了有许多刻意要显其富的事，也就是有许多为让其领导人挥金撒银而让其老百姓节衣缩食的事。

无庸讳言，此时中国之所以能当上许多穷国的头，之所以能做成“国际丐帮”的帮主，主要是因为已向那些穷国撒了大把银子，故能获得他们的支持。进而言之，如此“当头”实是在搞“贿选”，实是在用大把银子换取大把选票，换取诸多穷国投给中国的大把选票。

也正因此，这些穷国的领导人都很明白，只要捧好中国的场，就会碰上类

似“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比如可以得到非常优惠的贷款和商品，甚至可以得到无需偿还的赠款和赠品。于是，他们纷纷来到北京大说恭维话，不仅恭维这个国家，还恭维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给他戴许多高帽子，比如把他称作“世界领袖”。接着，他们便张开随身带来的大口袋，去接这位“世界领袖”兴冲冲撒下来的大把银子。

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似可被诠释为“一切历史都是可被当代人根据当代境遇做出重新解读的历史”。同理，上述邓小平有关“不当头”的告诫，也可被当代人譬如笔者，根据当代境遇譬如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境遇，做出重新解读。那么，笔者能就此做出什么样的重新解读？或是能从中重新解读出什么样的历史意蕴？

其一，能从中重新解读出那些在此前已被揭示过的历史意蕴，从而表明上述邓小平告诫仍有着还未过时的现实意义，故而仍能警示当下。因为现时中国领导人“不忘初心”，仍想让中国当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头，也就是当一帮穷国的大哥，做国际丐帮的帮主。

他们鼓动这帮穷国去向那些富国搞事情：或是去向那些富国发牢骚，发那些富国不该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牢骚；或是去向那些富国要东西，要那些富国早该拿出来资助他们的东西。

他们还代表这帮穷国去向那些富国提意见：或是不断重申发展中国家本应拥有的权利，即本应从发达国家那里获得更多尊重和更多补偿的权利；或是不断强调发达国家本应做出的义务，即本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鼓励 and 更多资助的义务。

其二，能从中重新解读出某些在此前未被揭示过的历史意蕴，从而表明上述邓小平告诫仍有着尚可延展的空间，即从中还可引申出一些新的观点：

一是从中还可引申出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还应该特别注意不要去当那些属于集权制国家的穷国的头；否则的话，就不仅会成为许多穷国的头，还会成为许多集权制国家的代表，进而会成为许多民主制国家的公敌。

二是从中还可再引申出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还更应该特别注意不要以这样的双重身份，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又作为世界最大集权制国家的双重身份，去当那些属于集权制国家的穷国的头；否则的话，就不仅会成为许多

民主制国家的公敌，还会成为这些民主制国家决意要联合起来动用一切手段予以彻底围堵的最大公敌，就像他们当年围堵苏联那样。

其三，高调处理中国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关系。

改革开放前，中国忙着同许多不发达国家做朋友，大多数时间都混在一帮穷国家里，还兴致勃勃地要当这帮穷国家的头；结果不仅越混越穷，以至于混成了“国际穷棒子队队长”，而且越当越亏，以至于亏成了“世界头号冤大头”。

到了改革开放时，中国又忙着同许多发达国家做朋友，尤其是忙着同最发达国家美国做朋友。如邓小平所言，“要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首先就要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他国家开放都没有用”¹；结果获得了以美国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积极回应，即积极帮助中国进入了由他们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并因此而使中国赢得了长达三十余年的超高速增长期，其GDP现已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可是，进入了“某某新时代”后，中国似乎又反转过来（毋宁说又倒退回去）：一方面又再次忙着同那些不发达国家套起热乎来，既拉圈子又撒银子；另一方面又再次忙着同那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较起劲来，并且是大张旗鼓地较起劲来：比如你们越是要制裁俄罗斯、叙利亚、伊朗等国，我们就越是要力挺这些国家；又比如你们越是要发难中国人权问题，我们就越是要疾呼请勿干涉内政；又比如你们越是要夸大中国制造的潜在威胁，我们就越是要隆重推出中国制造的十年赶超计划（即由中国政府于2015年5月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²，就是要让你们知道好一个“厉害了我的国”！

这就好比一个人最初住在一条非常破旧的老胡同里，成天和一帮非穷即赖的胡同串子泡在一起，过着一种瞎折腾且极穷困的日子。突然有一天，此人萌生了要换一种新活法的意愿，于是走出了那条老胡同，来到了一条大马路，一条由那些发达国家率先开辟并长期维护的大马路，于是辛辛苦苦且快快乐乐地干起了运输行当，先是开三蹦子车，继是开四轮轻卡，后又开十轮重卡，赚得

¹ 引自李慎之：《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载《李慎之文集》（自印本），第334页。

² 这个赶超计划显然有点不切实际，因为，如今中国虽可以说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但不能说是一个制造业强国，因为在许多高端制造领域，我们与发达国家还有着远超过十年的巨大差距。一个突出例证，就是作为世界头号高铁大国的中国虽已能制造高铁上的大多数部件，但仍不能制造高铁上的一些关键性部件。又如，中国虽已能制造飞机上的许多部件，但仍不能制造飞机上的最核心部件即高效发动机。又如，中国虽已能制造手机上的许多部件，但仍不能制造手机上的最核心部件即操作系统；正如网传任正非曾不无夸张地自嘲道：在研制手机操作系统方面，华为公司可以用不到三百年的时间赶上谷歌公司。

满盆满钵。可好景不长，此人又萌生了想回那条老胡同再会会那些老胡同串子的意愿，于是下了那条大马路，拐进那条老胡同，同时还不时回过身来朝身后方向既做鬼脸又吐口水，甚至还怪声怪气地吼上两嗓子，似是在表示老子不想和你们耍了，也不想领你们情了。

显然，此人如此做派颇有些过河拆桥的意味，即以一种恩断义绝的方式来回报那条充满生机的大马路以及那些辛勤维护这条大马路的发达国家，也就是那些已经既实行市场经济又实行民主政治的发达国家，也就是那些还希望中国也能够尽早既实行市场经济又实行民主政治并因此惹恼了中国当局的发达国家。

在中国政府高调处理与发达国家关系的一系列举措中，最突出者亦是最至关重要者，恐怕就要数其曾一再高调要构建所谓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举措了。

胡锦涛在位时，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就已高调提出（2012年5月），要在中美间构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即一种以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为核心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对于这一主张，不仅中国政府持正面立场，而且美国政府亦持正面立场，如国务卿希拉里宣称：中国不是苏联，中美不应走向冷战；中美要建立一种在竞争与合作中实现最佳平衡的大国关系，而这是没有先例可循的。

习近平上台后，中国政府又一再重申这一主张。对此一再重申，美国政府则逐渐转变态度，即由暧昧到持续暧昧直至火爆翻脸。与之相应，中方亦做出应对，即由高调到坚持高调直至无所适从。

起先，美方还作礼貌性回应，只是点头，不接话茬。中方则继续高调重申，先是追着奥巴马总统表白，后又追着特朗普总统表白。

后来，美方完全不予理会，王顾左右而言他。中方则仍不觉得无趣，而仍在高调表白，以致自说自话，几成单相思状。

再后来，美方终于隐忍不住，一下子掀翻了桌子，还撕破了脸皮，先是开打贸易战，继又要搞全面脱钩，即要在各个领域都准备与中方切割，甚至准备冒与中方断交的风险，如借大使辞职来降低美国驻中国使馆的级别，同时提升台湾驻美国机构的级别，实已触碰到中美关系的红线。中方则对此整个“懵圈”，不知如何应对是好，而只能很无助地进行敷衍，或只能很空洞地表示反对中美全面脱钩，或只能很空泛地强调发扬中美传统友谊。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方面为什么会在习近平主政后逐渐改变对华

态度？为什么会由温和变为严厉乃至掀翻桌子撕破脸？为什么会最终拒绝与中国方面构建所谓“新型大国关系”？

显然，这期间有缘于不同方面的诸多原因，既有缘于美国方面的诸多原因，也有缘于中国方面的诸多原因。不过，限于篇幅，笔者在此只能侧重谈及缘于后一方面的某些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2012年以来，中国方面就日益变得过于张扬或过于炫耀，并因此而日益变得招人嫌弃，招日本人和韩国人嫌弃，招英国人和德国人嫌弃，招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嫌弃，尤其是招美国人嫌弃。

一个最突出的例证，就是此时中国非常张扬且非常炫耀地向这个世界提供所谓“中国方案”，也就是非常希望这个世界能够正面地认可并效仿中国。

那么，什么是所谓“中国方案”？直白地说，就是当代中国所实行的改革方案，也就是中国经济之所以能获得急剧增长的改革方案。

那么，什么又是当代中国所实行的改革方案？概括地说，就是“集权政治”加“市场经济”的方案；或用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话说，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¹。也正是依循这一改革方案，当代中国发展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这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也可说是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为，这两种说法说的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不同方面：就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来说，其“中国特色”就在于它是要“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就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说，其“中国特色”就在于它是要“发展资本主义”（或说是“发展市场经济”）的。

这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起来的，而这个“共产党”既可以指各级“共产党官员”，也可以指这个“共产党国家”。因此，主要依托前者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自是带有非常浓厚的“权贵资本主义”的色彩，其间多有寻租，多有腐败；而主要依托后者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自是带有非常浓厚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色彩，其间多有低效，多有挥霍和浪费。²

¹ 引自笔者访谈：《宗凤鸣先生谈赵紫阳思想》，载拙著：《中国改革模式——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第510页。

² 参见拙著：同上，第186-188、198-201页。

显然，如此“中国方案”，是非常不同于发达国家曾已提供过的那种方案，即那种“民主政治”加“市场经济”的方案（按：其间还可分为多种方案，如可分为偏重社会保障的北欧型方案和偏重自由竞争的北美型方案以及诸多介于这两者间的过渡型方案），因而有可能会走出另一种发展路径来。

也正因此，对于如此“中国方案”，发达国家是心存疑虑的，不仅疑虑其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坏的资本主义”，即一种既缺乏公平（如贫富严重分化）又缺乏效率（如国家挥霍无度）的“坏的资本主义”；还疑虑其因缺乏正确的方向感而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坏的爱国主义”，即一种既有扩张欲望（如大肆鼓吹战狼文化）又有国家实力（如GDP排名世界第二）的“坏的爱国主义”。

可是，中国方面似乎并不在乎发达国家有这些疑虑，反而通过自己的种种大肆张扬的言行举止去做实他们的这些疑虑。有鉴于此，美国方面也就不可能会与中国方面去构建那个所谓“新型大国关系”。

再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审视上述中美两国对峙的性质？

概略地说，至少可以运用两种审视方式：一种是仅仅依据现实功利尺度的审视方式，另一种则是不仅依据现实功利尺度还依据价值理念尺度的审视方式，或说是兼而依据这两种尺度的审视方式

若是运用前一种审视方式，就有可能把上述中美之间的对峙，只看作是一个“守成大国”与一个“崛起大国”之间的对峙，或只看作是一个“老大”与一个“老二”之间的对峙。这也是中国官方颇为认可的观点，进而也是那些千方百计想贴近中国官方的学者们竭力要彰显的观点。

若是运用后一种审视方式，就有可能揭示出上述中美对峙所具有的双重性质：既是一个“守成大国”与一个“崛起大国”之间的对峙，也是一个“最大民主制国家”与一个“最大集权制国家”之间的对峙。换言之，中美两国之间的对峙，已不是一个“老大”与一个“老二”之间的对峙，而是一个“老大”与另一个“老大”之间的对峙，或说是两个“老大”之间的对峙。

事实上，许多发达国家在同中国打交道时就已经兼而使用上述两种审视角度，一方面使用那种基于功利尺度的审视角度来看待中国，并看出其中有着许多商机的一面，或说是有着巨大诱惑的一面；另一方面则使用那种基于价值尺度的审视角度来看待中国，并看出其中有着专制集权的一面，或说是有着“非

我族内”的一面。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发达国家在同中国打交道时总是持双重态度：在同中国谈及经济问题时持一种态度，一种热情洋溢且谈锋甚健的态度，比如常就投资开发问题谈得兴致盎然；而在同中国谈及政治问题时则持另一种态度，另一种满脸严肃且话不投机的态度，比如常就人权问题谈得不欢而散。

还需指出，这些发达国家在谈及中国经济问题时，一旦深入触及到中国经济制度就会有所保留，就会拒绝承认中国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也就是拒绝承认中国经济与发达国家经济具有相同地位。因为，在这些发达国家看来，中国所搞的市场经济只能算是“夹生饭式”的市场经济，例如，国企占比过大，国家干预过多，致使产权不够明晰，竞争不够充分，从而有违市场经济所应有的基本的要求，更何况这种“夹生饭”现象自“某某新时代”以来愈演愈烈。

不过，许多中国领导人，包括许多很想亲近中国领导人的中国学者，通常都是从那种只依据功利尺度的视角来看待中美力量的消长，都是将这一问题只归于功利层面上的问题，比如归于两国GDP层面上的问题：一方面承认美国GDP的总量仍然超过中国GDP的总量，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国GDP的增值率远远超过美国的GDP增长率，因而据此高调宣称中国赶超美国已势所必然。此外，他们就很少从价值理念的层面，比如民众是否享有充分自由、官员是否受到有效监督、私有财产是否受到严格保护、国家权力是否受到严厉管控等价值理念的层面，来看待中美力量的消长。

事实上，仅仅依据功利尺度来看待问题和辨别是非这一实用主义认知模式，现已为许许多多中国人所接受，以致成为弥漫在当代中国各个阶层里的一种文化风尚。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代中国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洗礼，因而仍保留着这一时代的诸多遗风，尤其是仍保留着文化大革命的诸多遗风，其中就包括这种只讲现实功利不讲价值理念的文革遗风。¹

也正因此，那些深受文革遗风影响的许多中国人，包括许多中国领导人，都很难读懂上述发达国家打量中国的那种双重目光，那种既基于功利尺度又基于道义尺度的目光，那种既透出很大兴致又隐有许多轻蔑的目光。

当中国的经济实力还很有限时，那些发达国家还不太在意中国的发展取向。

¹ 此处所谈到的这种只讲现实功利不讲价值理念的文革遗风，笔者曾作过专题论述。参见拙文：《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载《记忆》（美国华忆出版社出版）2020年第1期。

因为，他们觉摸着此时的中国无论朝哪个方向发展都不会翻出什么大浪来，因而也就能以一种比较从容乃至比较宽容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的发展取向。

可是，当中国的经济实力急剧上升时，特别是当中国的年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并逼近世界第一位时，那些发达国家就非常在意中国的发展取向，就非常在意中国究竟是要向民主制方向发展还是要向集权制方向发展。因为，他们认识到此时的中国无论朝哪个方向发展都将会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势力版图，因而也就会以比较计较乃至比较苛刻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的发展取向。

而对于发达国家的这一关注，此时的中国不仅不遮遮掩掩，反倒是以诚相告，并且是大肆张扬地以诚相告（生怕对方看不清楚或听不明白似的）：实不相瞒，你们所关注的这个国家并不打算向民主制方向发展，而是决意向集权制方向发展，这正是我们的“初心”所在。

例如，在经济领域，我们就是要搞带有集权性的国有经济，就是要搞有违自由竞争的国家垄断和国家干预。我们决意要将国有企业视作“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即“党的执政基础”），决意要“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参见前文相关内容）

我们还于2018年十分隆重地纪念一个人和一本书，即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以表明我们“不忘初心”。因为，前者曾宣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¹；后者曾宣称：“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又如，在政治领域，我们就是要搞完全集权化的“一党专政”，就是要强化执政党对于这个国家的全面管控。我们明确拒斥“三权分立”，尤其拒斥“司法独立”。我们还明确坚持“媒体姓党”，并为此严格监控各种传媒，尤其严格监控互联网传媒，还斥巨资在国内互联网与国外互联网之间垒起一道高高的防火墙，不惜将数万万中国互联网网民孤悬于世界互联网之外，不惜将整个中国互联网降格为一个局域网，一个视域狭窄且格调低下的局域网。

我们还进一步强化了执政党最高领导人对于这个党和这个国家的绝对领导权，就是在把“一党专政”的事做得很彻底的基础上，又把“一人专权”的事，即一人既专权于整个执政党又专权于整个国家的事，做得很彻底；也就是做出

¹ 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1-832页。

了先主席毛泽东曾做过的那种事，那种曾在一段时间（即1958年至1962年间）将党务大权、军务大权以及政务大权（包括国务院大权）都统统集中于其一身的事。（参见前文相关内容）

最了不起的是，我们还敢于向全世界展示那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非常奇葩的修宪路径：先是高层密室议定，继而整体打包表决，最后一本正经地公告天下。而在此次对宪法所做的诸多修改中，最重要者莫过于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这也就意味着，现任中国国家主席在做完两届后还可以不受限制地做下去，即可以搞成那种终身制，那种已为所有现代文明国家所摒弃的终身制。（参见前文相关内容）

再如，在对外关系方面，我们就是要超越“韬光养晦”，就是要搞得十分张扬。我们不仅敢于去当“头”，敢于拎着大钱袋子去做“国际丐帮帮主”；还敢于亲近一些不三不四的国家，一些特别招现代文明国家痛恨的国家，并与它们相互守望且相互激励。

我们还搞所谓“虽远必诛”的“战狼外交”，谁也不能批评当下中国，尤其不能批评当下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和当下中国的基本人权状况。谁敢做此批评就怼谁，怼美国、怼英国、怼欧盟、怼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等。此前我们还怼过日本、怼过韩国，还砸过前者的车、封过后者的店。有时还怼得过急、过猛，以致显得像是悍妇骂街。

通常外交辞令都比较克制与含蓄，都只把十分的意思讲出五、六分的话来。可近些年来，我们外交部发言人的外交辞令就很是夸张乃至肆意汪洋，竟能把十分的意思讲出十五、六分乃至二十五、六分的话来。最近的一个突出例证，就是竟能把某一些人的政敌说成是全人类的公敌。如此不加节制的外交泼骂已成国际笑料，娱悦了包括那个“人类公敌”在内的许许多多的人。

上述如此“大肆张扬”地“以诚相告”，也可看作此时中国是在向全世界民主制国家叫板，尤其是在向那些很发达且很强大的民主制国家叫板：你们越是担心我们将会变成什么样的国家，我们就越是表明我们将会变成什么样的国家，即变成那种既坚持集权制度又拥有雄厚实力的国家，也就是那种既有些类似“一战”和“二战”时德国又有些类似“冷战”时苏联的国家！

可问题是，这一百多年来的世界史，这一百多年来以两次世界级“热战”

和一次世界级“冷战”为最重要事件的世界史，也已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这个世界上的民主制国家，尤其是那些最发达亦是最强大的民主制国家，已不会容忍任何集权制国家能够在其面前“做大做强”并能够向其发出重大挑战。

非常遗憾，此时的中国领导人似乎还不具备这一史识，不仅不“韬光养晦”地掩饰其治国意图，反倒非常炫耀且非常急迫地表明其治国意图：就是要让其治下中国成为一个“做大做强”的集权制国家，或说是一个“震撼崛起”的集权制国家，从而实现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说是所谓“中华帝国的再度崛起”。

与此相应，此时的中国也就很像一个“二愣子”国家，羽翼尚未丰满就敢闹出很大动静，就敢不知好歹且不知轻重地吆喝起来：

我就是个不忘“初心”（即书写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里的“共产党原教旨”）的集权制国家，一个决意要消灭“私有制”和“资产者”的集权制国家！

我就是个“一党专政”的集权制国家，一个决意要拒斥“民主化”（如实行“三权分立”的制度）和“自由化”（如保障公民真正享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的集权制国家！

我还是个“充满自信”的集权制国家，一个充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集权制国家！

你们若有不服，尽管放马过来！

这也就意味着此时的中国决意要做一个特别张扬的集权制国家，一个特别能招致民主制国家警觉乃至敌视的集权制国家，一个特别能激使民主制国家抱团予以围堵的集权制国家，一个特别能给自己制造敌人的集权制国家，一个特别能把自身变成靶子的集权制国家。

概而言之，此时的中国既如此“集权”又如此“张扬”，自是不免会招致许多民主制国家群起而围堵乃至围攻，自是不免会使人想起老电影《英雄儿女》中的一个经典画面以及一句经典台词：在硝烟弥漫且光芒万丈的我方山头阵地上，志愿军战士王成正对着步话机话筒大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研究】

成都军区“四大”始末

陈永迪

内容提要：军委决定成都军区作为“四大”试点。司令员黄新廷、政委郭林祥以“贺龙班底”之罪被清洗。甘谓汉、韦杰临时主持工作。甘、韦持《军委八条》搞“二月镇反”，四川抓“反革命”达十万。中央下达《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军区班子再次改组，张国华任第一政委、梁兴初任司令员，其后50军奉调入川。梁排挤军区原主要干部并大量安插同“山头”干部。“九一三”后梁被判“上贼船”遭撤。1973年，秦基伟任司令，军区老人终得迅速“解放”。

关键词：军队“四大” 支左 二月镇反 中央处理四川问题 人事变动

1966年5月，叶剑英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林彪提出的军队文化革命总方针，即：军队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既要搞好革命，又要保持战斗力，加强战备。为此，总政又制定了全军文革正面教育十二条，具体贯彻这一总方针。

4个月后，文革运动已在地方轰轰烈烈展开，10月1日，第二军医大学的学生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泽东反映军事院校文革依旧死气沉沉的情况，3天后的10月4日，军委举行扩大会议即专门开会讨论了军事院校文革问题，同意对军事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意见。次日，军委正式发布《紧急指示》，批准军事院校一律开展“四大”。《紧急指示》打开缺口，“四大”的洪水很快向军内各大单位蔓延。11月，全军文革会议在京召开，正式宣布在部分总部和大军区机关开展“四大”试点。成都军区不幸被选中。

开展“四大”的试点

1966年11月15日，成都军区在北较场¹小礼堂召开军区机关二级部长以上领导会议，黄新廷宣布了军委这一决定。北较场之所以会成为十三个大军区机关中开展“四大”的试点，表面上是因为成都军区地处内陆，不临边、不临海、

¹ 北较场是成都军区司令部、政治部驻地。建国前是国民党陆军大学驻地，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晚就住北较场“黄埔楼”。以下文中，“北较场”一词，也有军区大院或成都军区的含义。

没有直接御敌的战备任务。深层原因则可能与军内的山头有关——成都军区两任司令员：贺炳炎上将和黄新廷中将，都是贺龙的爱将，坊间早有“贺龙班底”的说法。另外，从历史上看，成都军区所属部队均创建于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¹（129师），其军、师、团各级干部中山西人居多，人称“晋绥系”，于是，成都军区又被人称是邓小平、贺龙的部队……总之，在林彪地位如日中天的文革初期，需要对成都军区进行打理，当是情理中事。

当时，军区领导不知道“试点”怎么试法？要达到什么目的？于是便安排司令部派有文化的士兵随时去抄一些大字报，然后整理上报。另一方面，组织军区级和一二级部的领导，到所在部门听取意见，面对面接受批评。

可惜，这一套办法已经过时，“四大”洪水来势凶猛，局面很快失控。黄新廷的儿子黄西平回忆：

小礼堂会议之后，几乎一夜之间，北较场内，营区东西大路靠操场一侧，搭建起一长排竹席棚子，作为张贴大字报所用。大字报棚向东一直蜿蜒到小礼堂，向西则一直搭建到小车队大门前，长达数百米，可谓“壮观”……几天之内，人们为了争相显示“紧跟照办”的路线斗争觉悟，针对上至军区司令员、政委，下至二级部长，揭发批判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张贴出来。有上纲给军区领导挂黑线人物的，有批判领导工作作风简单粗暴的，有揭秘各种人际关系的，有揭发生活上贪图享受的……²

仅仅月余，大字报棚便显得不够用。新写的大字报不断把原先的大字报覆盖住，引发大字报作者之间产生纠纷，进而又变为批判军区领导不支持“四大”的新罪行。有鉴于此，政治部又从二营门后沿《战旗报》社向东到204院（政治部领导住宅区），建了第二批大字报棚。

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和体工大队的部分人员，率先起来“革”军区文化部、宣传部等部门部长的“命”。文工团和体工大队在北较场首先揪斗了部长尹超凡、副部长董元青，及宋刚、李漠。因宋刚从青年部调入文化部不到一年，“火力”自然集中在批斗尹、董、李三人。身高力壮的体工队运动员，将文工团用纸糊的高帽子扣在这几个部长、副部长的头上，胸前挂上“修正主义分子”的大纸

¹ 10军、11军、12军、60军、61军、62军分别由晋冀鲁豫军区的2纵、3纵、6纵、8纵、13纵、15纵组建而成。

² 《北较场风雨轶事》页191—192。该书系成都军区人员（含家属）的回忆录合集。自印书。

牌，被强押着一边敲锣，一边在北较场大院游街。

不久，火力从文化部门转移到司令员黄新廷、政委郭林祥身上，黄新廷被冠以“黄霸天”，郭林祥被冠以“郭老修”。黄、郭的重要罪状是子虚乌有而耸人听闻的“兵变”。据军区副政委余述生的子女回忆¹：

造反派判黄新廷、郭林祥在成都军区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参与贺龙篡军夺权活动”“要搞兵变”等等。文革前成都军区在灌县大深山里搞国防工程施工，招了一批年轻力壮的民工，便于保密和统一管理，给每位民工发了一套军装，只是没有领章、帽徽。于是，就说是黄、郭招募的“黑兵”，为“兵变”组建的武装力量。鼓动这批民工来北较场大院造反，冲击机关办公大楼。

军区战旗文工团话剧团演员金乃凡（1980年代任军区话剧团团团长，大校军衔），保留有当年的日记，他的日记中记载了第一次批斗军区领导的实况²：

1966年11月21日星期一日记：

上午毛著学习刚结束，全团集合，由值星任任一传达：19号的早晨，黄新廷司令员接见了哈军工和军艺的那伙学生，未经军区党委的同意，在学生提出的十项要求上签了字。军区党委否定了这十项要求。但学生已经拿着黄司令员亲笔签署的要求书，对外进行了宣传。其中一项，是今天在北较场召开全体军人大会，由他们控诉军区的反动资产阶级路线，并要求军区公开向他们道歉。军区党委决定，不开军人大会。为防止意外，通知各单位，没事不要去北较场，不掺合这件事。

散会以后，我和万仓还是偷偷去了北较场，我倒很想看看今天军区会发生什么？去了北较场，似乎一切都很平静。忽然听到会议室前锣鼓喧天，赶紧奔向会议室，只见政治部机关干部在那里集合，手拿着“炮轰余述生”（军区副政委、政治部主任）“火烧孔骏彪”（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标语，前往会议室大厅走去。

军区的余副政委、政治部的孔副主任、牛副主任、崔副主任及各部正副部长正在会议室开会，急忙迎出，就这样，一场“冲击政治部党委”的批判

¹ 《北较场风雨轶事》页 374。

² 《北较场风雨轶事》页 319—321。

大会开始了。大家的情绪很激昂，高呼“余述生是保皇派”“打倒保皇派”之类的口号。每个发言者的口气都是相当的严厉，完全是斥责，弄得四位政治部首长无措手足，在群众面前慌了神，主动站出来交待和揭发黄司令员和郭政委的问题。中途群众不断高呼口号，大声斥责，以打态度（即打耳光、拔领章帽徽、剃阴阳头、往脸上泼墨汁等，先把“神光”褪了，再进行批斗，美其名曰，以打端正态度，是对人格的极大侮辱——本文作者）。

此处高潮刚过，司令部又在会议室里干开了。他们的声势更为大些，不仅是人多，而且语调也更激昂，作法也更厉害。他们把三位首长（我不认识）勒令站在桌子上，严斥声中有人还骂道“癞皮狗”“走狗”之类的词。在司令部的“冲击会”中，我和万仓因为被怀疑，随即离开了会场。

下午以政治部党委的名义，召开了揭发黄、郭、何（何正文，军区副司令员）三家村的大会。地点在政治部楼前的广场上。大会是由司、政、后机关选出的主席团掌握。主席台上，军区党委常委几乎都在，黄、郭、何被指定坐在台前，后面有韦杰、余述生，后勤金政委（金世柏，军区后勤部政委），冯部长（冯丕成，军区后勤部部长），甘政委（甘渭汉，军区第四政委）等人。主席台四周挂满了“打倒黄、郭、何，三家村黑帮”之类的大字标语，黄、郭、何三个字不仅被艺术化了，东歪西倒，或倒置过来，每个字还加上了判决死刑犯人的红圈圈或红叉叉。他们三个人愁眉紧锁，低着头只顾记录，很不安。大会先由余述生揭发，再由茹夫一参谋长、李文清副司令员、孔骏彪副主任依次揭发。这些人虽然不是被告，但也不是原告的身份。上得台来，一举一动，受大会主席团——平日普通干部的支配，发言还是小心谨慎。上午批斗会的余惊还未散尽。群众在下面掀起一阵又一阵的口号声浪，算是给几位揭发者加油，给黄、郭、何示威。除此之外，还向主席团传递了无数条子。主席团倒是很民主——向大家念了这些条子。其中最引大家兴趣的是：把张广恩、杨白冰、刘远道抓来示众！话一出口，众大哗！台下热烈响应。不一会儿，昔日的副参谋长张广恩从台左灰溜溜进来站在台下，眼睛里闪烁着惊恐。昔日的副主任杨白冰从台右被两人推搡进来与张左右站定。

杨白冰，我简直认不出他来了！穿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旧棉衣，脸色蜡黄，精神颓废。原来在文工团时的神态威风一扫而光。变化得真快呀！他被

推进来站定时，脖子还一歪一歪地，嘟着嘴，眼睛左右环顾，看样子不太服气。他俩站了一会儿，主席团宣布示众完毕，在一片吆喝声中，张、杨分别从左右退下。杨仍是被两个人押着走的……

会议临结束时，刘远道才被两个战士反缚其手推进会场。他已经被判了刑，称敌我矛盾，群众对他更不客气了，一片喊打声中，令其跪下，他战战兢兢、老老实实就地跪下。后又令其站在一个独凳上，他又连爬带奔地站上去，最后让他低头。经群众这一吓，他都分不清东南西北，目光呆滞地冲着大家愣神，两个战士狠命将他头按下，他才低了头……

11月22日星期二日记：

司、政机关的揭发批判大会在小礼堂继续。话剧团集队参加。下午又轮到另一个“保皇派”——保卫部长魏敬斋揭发。他一上台便慌了，台下群众一施加压力，竟“委屈”地落泪。他向大家表白，自己是如何正确，如何两头受气，如何被黄司令员欺负，越说越伤心，直至嚎啕大哭，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伏案不起。群众对他突来的难过，先是笑后是烦，要求赶他下台。主席团的人去拉他时，他像戏剧里的反派人物一样，猛地站起，挣脱手臂，擦一把泪（泪立即止）愤然吼到：不！我要揭发……后来他再说些什么，我懒得听，退场了。

可惜，我漏听了涉及本文中最重要的情节。魏敬斋随后公开了军区保卫部掌握的最高机密：杨白冰是特嫌，黄新廷包庇他。

11月24日日记：

上午沈汝敬政委传达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文件。谈到由于魏敬斋急于表白自己，把杨白冰的特务活动一案公布了，泄露了秘密。军区不得不把杨白冰逮捕¹……

后来，军区第四政委甘渭汉到北京汇报开展“四大”的情况，返回后于11月24日传达了让北较场震撼的军委指示：司令员黄新廷、政委郭林祥、副司令员何正文，副政委余述生犯有严重的路线错误，停职检查。

与其它军区机关开展文革的情况相比，成都军区机关批斗黄、郭火力高度集中，意见高度统一。军区开展“四大”以来，没有“保黄派”，不管是基层干

¹ 关押杨白冰的罪名是尚未坐实的“特嫌”。在军区政治部华阳看守所共关押九年。

部，或是高级干部，没有人敢保“黄霸天”，不仅不保，而且使出浑身解数与黄、郭划清界限。大字报揭发的问题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有关“贺龙死党”，证据就是他从参军就跟着贺龙，从士兵到将军都是贺龙提拔的，贺龙到军区视察工作，他陪着吃饭、看戏、钓鱼。到北京开会，只串贺龙的家门，从不去看望林副主席；另一类是生活“腐化”，黄新廷一家住在当年为蒋介石建的黄埔楼，那是一个单独的占地几亩的大院，德国人建造了一栋欧式三层别墅小楼，院内树木参天、鱼池、花园齐全。人们把从黄新廷家抄出的东西摆到马路上办展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三大件：电子管电视机、席梦思床垫、落地式台灯；郭林祥平时穿着整洁，家中讲究窗明几净，客厅里摆放了一架钢琴，他的家也成了“展览馆”。半年后，成都军区新司令员一家要搬进“郭老修”的小楼居住，新司令员夫人看过房子后，随口说到：“住这房子，就修了吗？我们在广州军区的房子比这好得多哦。”

与此同时，军区机关还出现了众多“战斗队”，著名的有司令部的“红色造反派”（简称“红纵”），政治部的“千钧棒”，这些战斗队主要由科级以上干部组成，人数不多，影响不小。这几支战斗队，在批斗黄、郭、何及其它领导时有过火行为，招来军区领导的怨恨，成为“二月镇反”首当其冲被抓的对象。

其实，有过火行为的不止造反派。黄新廷、郭林祥成为众矢之的，“墙倒众人推”已成为一种群体现象，甚至个别二级部长也参与其中。副政委余述生在批斗时，被一位曾因生活作风问题受处分下放的原政治部二级部长，用拳头将眼睛打伤。“四大”烈火不断燃烧，成都军区已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一二级部长几乎全军覆没。从11月15日至24日，开展“四大”才9天，黄、郭、何、余就被停职，这在全军绝无仅有。

甘、韦上台

11月28日，军委通知，军区的工作暂由第四政委甘渭汉主持、副司令员韦杰、李文清协助。

甘渭汉，1965年11月，从总政干部部部长任上调成都军区，任第四政委（第一政委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兼、第二政委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兼、

第三政委为郭林祥)。甘渭汉新来乍到，与黄、郭没有历史渊源，因而在“四大”中没有受到冲击。

韦杰，成都军区仅有的两位中将之一（另一位是司令员黄新廷）。1929年韦杰参加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1935年1月，率侦察连抢先占领娄山关，为保卫遵义会议立下大功。1950年率61军入川，任川北军区司令员，政委是胡耀邦。1957年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调成都军区任副司令员。1951年，韦杰任60军军长，率部入朝参加著名的第五次战役。在第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敌我双方狼牙交错，战场形势错综复杂，60军180师在撤退途中被美军包围，全师只有少量人员突围。战后，毛主席亲自召见韦杰了解战况，最后给出结论：责任不能完全由韦杰负。

此二人上任时形势已非常险恶。李井泉东躲西藏，最后逃上海避祸，在家主持工作的廖志高、李大章等几位省委书记也被斗得东躲西藏，属下“揭竿而起”，纷纷向造反派靠拢。军区机关无政府主义泛滥，除了作战部值班室，大部分干部“放羊”。军区领导班子共9人，4人停职，在职5人，他们是政委甘渭汉、副司令员韦杰、李文清、邓少东，副政委余洪远。此时的甘、韦有权力而无权威，稍有不慎，造反的随时可能打上门来，批斗、体罚，甚至挂黑牌游街示众，主持工作如履薄冰。

“三支两军”

1月23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3月19日，《中央军委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称，“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的‘四大’，一般在三月底左右暂告一段落。除了照顾战备、援外和必需的工作外，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

这些决定改变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规定，人民解放军正式介入文化大革命。成都军区为此专门成立了“支左办公室”，派出大量干部战士分赴各单位进行“三支两军”，主要形式为军事接管，如接管省市公安部门，广播、报纸等宣传部门，成都市委等单位，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驻大专院校、训练红卫兵

等。成都军区部队的介入，使四川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新变化。

“1.29 事件”

1月28日，军委发布八条命令。军委八条第三条规定：“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第五条规定：“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可惜，气势如虹的造反派闹得正起劲，“军委八条”发布次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分团数千人，便冲击了成都市公安局并抢走部分档案：这就是成都文革著名的“1.29”事件。市公安局于是向军区求援，要求派兵镇压。军区主持工作的韦杰立即与正在北京汇报工作的甘渭汉联系，甘在电话中说：“老韦，西藏自治区前阵子也乱得厉害，抓了几个造反派，形势一下就稳定了，我看这个经验对处理成都当前的问题可借用。”韦杰说：“不管怎么说，军队和公安局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这块柱石不能不管那块柱石。那我就下命令调动部队了！”

1月30日，军区派出部队，在古中寺街成都少年宫，将街道分团部分头目抓获。抓人时，意外发现一位“大走资派”——省长李大章，于是将他当作“黑后台”一起抓走。事实是：当时李大章被街道分团扣留在少年宫，要求他签字解决街道分团提出的经济问题。

“217 信件”

2月10日，韦杰召开会议，说：“现在牛鬼蛇神都暴露出来了，就是要搞复辟活动，拼命地夺权。我们的认识和措施都要跟上来，我们的思想要坚定，不然就要被灭掉。”又讲：“军委已把调兵的大权交给我了，对阶级敌人就是要施专政，我要把那些打着造反旗号的头头，一个个都抓起来，把市大监和北较场都关满。”

笔者当年对“红纵”勤务组负责人徐耀明¹的采访记载：

2月11日，突然抓人起于军区作战部的王××，他是红纵的成员。“军委八条”（1月28日）下达后，军区机关的形势逆转，围攻红纵的现象频频发生。

2月10日王××在老保的围攻下写了一个材料（也可能他没有写过材料，而是被逼供的记录），说红纵的办公室设在黄新廷（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家里，在黄家里开过黑会，要成立什么“治安治乱委员会”，保黄、郭过关。根据这个材料，当天晚上军区党委决定抓人。从2月11日上午开始，陆续在军区机关、空字028部队、战旗文工团抓了許多人，被抓的人大部分属于军艺西南造反派（成员主要是军区战旗文工团的干部）、红纵（军区司令部红色造反纵队）、千钧棒（军区政治部千钧棒战斗队）等造反派组织。

在抓战旗文工团的人时遇到了阻力。战旗文工团的驻地孤悬在北较场外的正通顺街，2月11日晚，军区派了一个排去抓人。被抓的人当时大喊大叫：“老保抓人了！”喊声惊动了附近的居民，居民们自发地赶来堵住战旗文工团的大门，那一排战士被居民们围得无法动弹。居民们提出不放人就不准走，围了4天，直到2月15日军区派部队增援才解围，可见镇压造反派不得人心。后来，兵团、八二六等造反派得到消息后，也组织了大批造反派战士将军区大营门和东营门围住，要求放人，由此而引来了“217信件”。

军区战旗文工团的住地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那里曾是大作家巴金的家园，周围都是民房。据川大八二六勤务组负责人刘安聪²回忆：

2月11日，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来人向“川大八二六”求援，称据可靠消息，成都军区今晚要派兵抓文工团造反派。我带约100人擦黑赶到，不久果然来了一队军人，我指挥学生堵住大门，对文工团的人说，你们马上离开，有后门走后门，没有后门搭梯子翻进老百姓家出去，这里由我们对付。

当天下午，川大八二六、工人造反兵团等组织开始上街游行，要求军区释放被捕的军内造反派及兵团人员。遭到拒绝后，川大八二六的学生在北较

¹ 徐耀明，原成都军区司令部军务部科长，采访记录见《昨天》2017年100期。凡引徐耀明所言，出处相同。

² 刘安聪，原四川大学学生，川大八二六战斗团主要负责人之一。引文摘自刘著《“二月镇反”中的“川大八二六”》

场南营门和东营们开始静坐，引来大量围观的群众，把两道营门堵得水泄不通。随后几天，宣传车的大喇叭“打倒韦杰！”“打倒甘渭汉！”“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的口号声不绝于耳，静坐的人五花八门，并不断与军区警卫部队发生冲突。

此时，身处北京的甘渭汉在人民大会堂找到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向他汇报了成都军区的处境。2月12日，成都军区发布《紧急公告》称：“凡冲击军事机关的，都要以现行反革命论处。”事情僵持到2月17日，晚十点左右，北较场两个营门的大喇叭突然响起来，向静坐学生广播了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签署的《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的信》（史称“217信件”）。信中指出：军区派出部队协助公安机关捕捉抢劫成都市公安局几名首犯，对严重违反中央军委命令的少数军内人员采取措施是完全正确的，要“兵团”和“八二六”自觉执行中共中央1月14日《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和《军委八条命令》，指出不要围堵、冲击军区，不要干涉军人行动自由。劝告参加冲击的围困军区的人要提高警惕，防止坏人煽动捣乱，尽快撤离军区。

“二月镇反”

从2月18日凌晨起，成都军区开始通过广播向围攻者宣读信件内容。下午，军区派出直升机在成都地区散发了这封信，次日，又在宜宾等地上空散发。

针对“217信件”，八二六在现场的头头紧急商议，由八二六一号勤务员江海云在宣传车上宣读了《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五点声明》，当时就决定立即撤离军区。即使如此，江海云也很快被抓捕了。刘安聪回忆：

我们在撤退途中，已经有保守组织上街游行并开始抓“八二六”的人。江海云乘坐的宣传车就被围住，车上的大学生连人带车被押送公安局，车上的中学生则被撵下车去，江海云个子小，在“快滚、快滚”的吆喝声中被轰出……

2月23日，我和同学康易全上街观察形势，盐市口、春熙路一带闹市区到处是一队队游行的人。下午五点多钟，我们碰见江海云，三人一起往川大方向走，快到牛王庙街，又有一队工人从对面走来，喊着“打倒八二六”

的口号，江海云突然举起瘦小的拳头，冲游行队伍喊“打倒产业军”，吓得我和唐易全忙把她拉住，几个小伙子冲出队伍准备过街拿人，示威者们见只是一个小姑娘¹，不必理会，叫停了小伙子。

那天分手后，为安全计，江海云到一个女中学生的家借宿，那个女生很“贴”江，邀江去过她家几次，其父母也很欢迎。坐了一阵，女生借故出去，好长时间没回来，江隐约感觉不对，欲离开，却遭其父母阻拦，江明白已入险境，望着飞舞的雪花，写下一张字条。再过一阵，女生带几个男同学回来，指江是反革命分子，他们受了蒙蔽，现在要反戈一击。其中有一个学生不大说话，江悄悄把字条塞给他，然后就被扭送派出所了。江感慨道，“没想到中学生也会出卖人，他们太年轻了。”

2月23日，成都军区政治部发出《关于取缔各种非法组织的通令》²。据此通令，军区将“红纵”“千钧棒”等组织定性为“反革命组织”，采取“坚决取缔，立即解散，严禁继续活动。”的措施。据甘渭汉在“二月镇反”后的检讨会上透露，军区机关及空字028部队，一共被抓了120人。与此同时，军区及下属各军分区、武装部指挥地方公安机关将各地的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对参加造反的群众大肆抓捕。据官史记载，四川全省取缔造反组织1100多个，抓捕造反派头头及骨干分子8万余人，其中成都地区抓了33000余人。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向群众开枪的流血惨案。³

张、梁主政

1967年春末，毛泽东为反击所谓“二月逆流”而发起的反击右倾翻案运动，让四川的“二月镇反”迅速得以翻盘。3月底，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召开一系列会议以解决四川问题，政治天平向“二月镇反”中被镇压一方倾斜。5月7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中央领导接见四川全体代表的会议，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决定》共十条，因此被川人俗称为“红十条”，主要内容有：把李井泉、廖志高定性为“三反分子”，黄新廷、郭林祥是“党内最大

¹ 江海云个子矮小，身高仅1.42米，外号人称根号2，故易被人误为小姑娘。

² 成都军区政治部[67]政秘字第2号：《关于取缔各种非法组织的通令》1967年2月23日。

³ 参见《四川省志》（四川科技出版社，1999年版）和《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固追随者”，李、廖、黄、郭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二月下旬以来，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搞镇反，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张国华、司令员梁兴初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组成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张国华任组长，梁兴初、刘结挺任副组长；省革筹要对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组织、群众、干部一律平反等等。

张、梁两位将军随即同时正式入主成都军区。

张国华，江西永新人，到任前是西藏军区司令员、西藏党委第一书记。1929年参加王佐、袁文才的部队，参加这支部队的军人中，只有张国华授予了将军军衔。张国华历任红一方面军1军团教导队政委，八路军115师旅政委，1950年作为军长率18军进藏。1962年，在中印边界之战中任“前指”司令员，指挥所属部队打了一场威震全球的漂亮仗。其人面目清秀，有儒将之风。

此前的1967年2月6日，西藏军区党委曾给中央发电报：“拉萨革命造反总部”认为张国华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军区党委是“保皇派”“黑窝子”，军区机关部分干战出现思想混乱，建议中央对张国华尽快表明看法。2月7日，毛泽东看过这份电报并批示：

林彪、恩来、叶、聂、徐各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王其梅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

2月12日，中央军委复电西藏军区：“张国华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的，尽管他在工作上有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是个好同志，望军区党委同志向革命群众做些工作。”2月24日，中央文革小组再次电复“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指出中央军委的电报代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造反总部”立即表示拥护。3月初，张国华正准备返回，周恩来却将他留住，说：“要解决四川问题了，你是西藏的书记，也是西南局书记之一，你留下听听吧。”¹其时，中央便已决定张国华到四川任一把手。

梁兴初，江西吉安人，履新前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30年参军，历任红一方面军1军团2师团长、八路军115师旅长，东野十纵司令员。梁是解放军赫赫有名的战将，辽沈战役中曾指挥著名的黑山阻击战，坚守阵地五天五夜，

¹ 尹家民：“受困于‘文革’中的成都军区一把手”。《党史博览》2006年年第12期。

为全歼廖耀湘兵团做出重要贡献。1950年10月率38军入朝。第二次战役，三十八军表现英勇顽强，在关键时刻卡住了美军的脖子，为第二次战役取得胜利立了大功。志愿军总部通电嘉奖，彭德怀在电报上亲自写下：“38军万岁！”，从此“万岁军”军长的美名传遍天下。解决四川问题时，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向毛主席推荐梁兴初。

赴川前，林彪专门接见了二位将军，对他们说：“成都军区过去一直不放心，这次你们去了，就放心了。”

“红十条”的下达，使四川的形势顷刻之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二月镇反”时关在监狱里的军内外“反革命分子”绝大部分被释放，他们像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而保守派的主力“产业军”则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张国华和梁兴初，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到成都履职的。笔者作为亲历者，亲历了两位将军到来的情景：

5月16日早晨，听说张、梁要到，我们都兴奋地来到北较场大操场等候，空军派来的雷达指挥车几天前就停在那里，直升机反复演练起降，预示有大人物要降临。大约十点过，一架直升机从天而降，可是从机舱里走出来的不是张、梁。后来听说，他们坐车从危机四伏的被产业军武装控制的机场路直接到达市区，受到造反派和产业军双方的热烈欢迎，一亮相就赢得了双方的赞扬。¹

按照分工，张国华掌管全面，以地方工作为主；梁兴初协助张国华，以军队工作为主。他们积极贯彻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决定。二人到成都后立即召开各种会议，接见群众组织代表，发表讲话，大张旗鼓宣传“红十条”，为“二月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的组织和群众平反，道歉。二人所表明自己的立场：1. 认真贯彻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是搞好四川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保证。2. 要坚定地支左，不能摇摆，平反要高姿态，越快越好，不要扭扭捏捏；3. 瓦解产业军，不能采取武的办法，也不能压，要发动保守组织内部群众造反解决；对处理革命派之间的矛盾，要高举大联合的旗帜，求大同存小异，共同对敌；4. 刘结挺是受害者，主席支持他，我们也支持他，有缺点欢迎大家批评，等等。

文革初期成都军区开展的“四大”已不复存在。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因开

¹ 陈永迪：《我在‘二月镇反’前后的经历》，载《昨天》2017年第100期。

展“四大”而挑开并激化的军内外矛盾，注定还要在新的形势下，以新的形式继续发酵。

50军入川

“红十条”下达，“烧饼”又翻了一面。从“镇反”到“平反”的突变，被镇压的“反革命”一夜之间变成“革命左派”，让参与镇压的一方难于接受，大部分地区的干群转不了弯子。保守势力不愿意退出政治舞台，造反势力借“红十条”的威风，向保守势力发起反击，各地秩序混乱，武斗频仍。徐耀明的回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军区大院的混乱：

在军区大院凡支持兵团、“八二六”的人都被骂成“红纵”，砸汽车、打人（也有产业军混进来的人搞打砸抢）、撕大字报，凡揭发“二月逆流”的大字报都被撕，而“红成”贴的大字报就不撕。

政治部几个主任的通讯员公开组织“支产战团联络站”，很猖狂！成电红旗¹在军区大院的办公区、家属区、二营门等地到处刷标语：“三军一旗²好得很！”成电红旗出了小报《战线火报》，北较场内有专人和他们联系。政治部的董秘书长说：“有战士给我打电话：‘哪个要打倒产业军就不要怪我的子弹不长眼睛！’”³

四川原来仅驻有54军一个野战军，要有效稳定四川的文革局面，成都军区原有的支左力量显得捉襟见肘，且成都军区和个别地方军分区的不少干部、战士的立场与“红十条”精神相左⁴，急需增加新的维持秩序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调50军入川。

5月28日，军委领导在京西宾馆召见了50军的主要领导。副军长郑志士（军长为曾泽生，起义将领）的笔记记录了军委领导的指示⁵：

杨代总长（杨成武）：“这次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调50军到四川是一个

1 成电红旗全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红旗战斗团，与当时的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贫下中农战斗军等站在一起的群众组织，被认为是保守派。“二月镇反”时期非常活跃，其首领多为干部子弟。“红十条”下达后迅速瓦解。

2 “三军一旗”，指被称为“保守派”的产业工人战斗军、贫下中农战斗军、八一造反军（又称八一荣复军）和成电红旗。

³ 《昨天》2017年100期。

⁴ 驻军重庆的54军支持了以重庆815为代表的造反派，二月镇反中亦未深度介入。

⁵ 《郑志士笔记》系原文照片转录。

重要的战略措施，四川是我国的大后方，大三线在这里，人口多、物产丰富……现在54军、一个独立师、29个独立团，但不敷分配……这次调50军还有一个因素，解放战争时，50军曾进到成都附近，当时，未让进去……走得急是由于成都部队在支左中犯了错误，支持保守派，造成混乱……54军负担太重，现分散在各地区48个县……你们到后，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再组建一个师……中央已经决定了去了以后的部署，你们驻西部，以成都、双流、乐山为中心。”

肖主任（肖华）：“你们到四川后主要任务是支左。首先是政治思想上支左，宣传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去识别，锻炼左派……在调查研究中，不要先听军分区、武装部的介绍，要到群众中去，到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去了解……武斗在四川是最严重的，要很好宣传制止，不要带枪，军队本身要遵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开枪。就是宣传，要他们代表开会解决。……支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现在搞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服从他们及军区梁、张的领导，服从军区党委的领导……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搞好军民关系，你们是东北的部队，是四野的部队，很有影响，要注意到光荣传统……要和原来的住那里的部队、地方武装搞好团结，戒骄戒躁。”

50军到成都后，中央又决定成立成都警备区，警备区机关由50军军部兼，不另设机构。统一领导成都地区的军队支左，任务是支左及维持社会治安。

50军入川，使成都军区增加了一支成建制的野战军，拥有了稳定四川局势，制止武斗，统一川西地区支左部队行动的重要力量。不久，军区机关的乱象逐渐平息，大多数干部开始转向，以产业军为首的保守势力迅速瓦解。

50军在促使军分区、武装部转向方面也作出了成绩。以乐山地区为例，从4月底开始，武斗不断，城里的工交、商业完全瘫痪，水、电、粮经常中断，报纸两个月看不到。造反派占城里，保守派守城外，武装部长、军分区的部队带头参加武斗，军分区副政委杨永广、后勤部长副部长李元业、警卫连长就是武斗的急先锋。他们在军分区内有强大的势力，反对武斗的政委牛光义、江副司令员、王副主任等五人，被迫转移到130师的部队里。50军148师进驻乐山后，成立了乐山军队支左领导小组，统一指挥乐山地区的部队支左。首先将支

保守势力的独立营调到夹江，148师的部队在郊区逐步展开，做保守派的转向工作。敦促军分区的领导向造反派检讨、道歉，将牛光义政委请回来，参加支左领导小组。很快，乐山地区的局势发生好转。

军内造反派的结局

“二月镇反”时，军区机关、两团两队、空字028一共被抓120余人，四月份已全部释放。根据军委指示¹，军区机关已经停止“四大”，大字报棚被撤销。军区的主要任务已转向“三支两军”，释放出的军内造反派一部分人进了省革筹办事机构，成为省革筹办事组的支柱。还有一部分人参加军管，成为贯彻“红十条”的重要力量。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新的暗藏玄机随时等待发酵。

“二月镇反”中首先被镇压的“红纵”等军内造反派要求按“红十条”精神彻底平反。梁兴初作为因“红十条”而新晋的司令员，知道必须肯定“红纵”的大方向正确，同时，梁又深感造反派是一股破坏力量。还在广州军区时，他就曾被造反派弄去站桌子批斗，正在危难之时，传来林办指示，称边境出现紧急情况，要梁兴初立即去处理，由此梁得以“金蝉脱壳”，梁对造反派无好感。其时，正好发生了北京展览馆“5月13事件”²。既然中央对军内造反派持否定态度，梁兴初也就用不着掩饰自己的立场。笔者采访徐耀明记录：

张、梁首长在公开场合姿态很高，刚到时张政委表示成都军区坚决支持造反派，但为时不久态度就变了。特别是梁司令员单独接见红纵的谈话，接见前梁的秘书通知红纵的人说梁司令员要先听汇报，然后请红纵的同志谈点对工作的建议。但是，当晚一见面梁就说：“红纵还在活动吗？再活动就是违反八条了，你们要注意团结，不要搞分裂！”好像分裂是红纵搞起的。红纵汇报完后，梁抽象肯定红纵大方向是正确的，但调子很低。接下来就开始

¹ 1967年2月11日军委发布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第4条规定：“军队领导机关必须保持严密的、完整的指挥体系，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已经成立的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必须以行政单位进行改组。”

² 1967年5月13日，由军内各文工团保守势力组成的“三军革命派”在北京展览馆演出，得到毛泽东、林彪的支持。军内造反派不知内情，联合地方造反势力前去冲击失败。6月9日，“三军革命派”在人大大会堂小礼堂演出，中央领导人均前去观看并与演员合影。此事件的结局向外界表明，在军队，毛泽东是支持保守派的，是稳定军队的力量。

数落红纵的枝节问题，还把战旗文工团指责得一塌糊涂（5·19晚上梁接见战旗文工团全体干部，有两个人企图给他戴高帽）。那次谈话红纵没有得到任何支持……¹

5月20日晚上，即梁兴初到达成都的第四天。机关部分干部、战士、家属在一所（军区第一招待所，张、梁当时的住地）围住梁司令员。

有人问梁：“‘打倒产匪军’对不对？”

梁说：“那是错误的，解放十七年了哪有那么多匪！”

又有人问：“梁司令员在北京表态要依靠造反派搞革命？”

梁说：“我没有说过这些话，这是造谣，我正式辟谣！你们想一想红纵有多少人？是什么人组成的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会支持他们？”

有人说：“我们上街被骂为‘保皇兵’……”

梁说：“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兵！”

此后，“红纵”“千钧棒”作为群众组织逐步停止活动，军区造反派逐渐淡出政治舞台。

“海校”岁月

“红十条”给黄新廷、郭林祥定了性，称他们为“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固追随者”，在全军各大军区里，司令员和政委被中央文件点名定性的绝无仅有。张、梁到四川后，按照中央的口径，继续深挖黄、郭线上的人，造成一大批干部被打倒、关押、审查。

军区级的领导9人。打倒2人（司令员黄新廷、政委郭林祥），立案审查3人（副政委余述生，副司令员李文清、何正文），政委甘渭汉、副司令员韦杰，因“二月镇反”被批斗，以观后效；副政委余洪远一年后也在劫难逃。

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副参谋长6人，5个副参谋长中：温先星赋闲、朱玉庭离休、张广恩、薛碧天、胡永昌三人立案审查。唯一在职的参谋长茹夫一，虽是成都军区老班底的人，但他的资历与其他人不同，他是从广州军区42军调来的，抗战时期在八路军115师。

政治部主任、副主任6人，打倒或靠边站5人（主任余述生、副主任孔俊

¹ 见《昨天》2017年100期。

彪、杨白冰、牛击、崔殿臣），仅剩钱春华1人在职。后勤部被打倒4人（部长鲁家汉、副部长董家龙、周树槐、侯泽远）。二级部长遭难更是不计其数，司、政、后的主要二级部长几乎一锅端。

1968年10月1日前，所有被审查的军区、军、师级干部连家属，全部赶进天回镇东北角山坡上的“海校”，该校原为海军的一所通讯学校，1960年就撤销了，早已无人居住，房屋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当年的天回镇交通非常不便，与成都市区间仅有一路远郊公交车，发班少，且行驶速度慢，单程得走一个多小时，周边工厂的工人及进城的农民都坐这一路车，十分的拥挤。到了天回镇还要爬坡走很长一段山路，天气好时山路尘土飞扬，下雨天满地泥泞。起初，审查对象不许与家属同住，也不准与家属见面，每家派一名未成年子女送饭，家属称之为“送牢饭”。每月只发工资30%的生活费，不少家庭入不敷出，粮食不够吃，买几分钱一斤的红苕弥补。为了节约一分一厘，有家属甚至用手画的假公共汽车票乘车，被司机当场抓住，司机知道她的处境后放行。

专案组想方设法折磨人，山上只有一个水龙头，百多户人用水，每天只开20分钟，抢水成了一场大战。一天，杨白冰夫人在城里上班，回来晚了没抢到水，拿着两个空桶哭。幸遇何正文，他二话不说就下山去挑水，爬坡上坎二三里地，解了杨家的燃眉之急。多年后，一位贵为总政主任、军委秘书长夫人，一位已高升副总参谋长。杨夫人提起这件事还感动不已，她说：“那时，我处境最困难，其它人都不敢和我讲话，连我那亲戚都不敢理我，当时他也被打成黑帮，在那种场合给我挑水，真让我永远难忘。”¹

更为荒唐的是审查。军区一级的干部，重点查“参与贺龙兵变”，专案组的手段无奇不有。一次，新任负责专案的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钟池提审李文清，他手上拿着一张纸，在李文清面前摇晃了一下，说：“这是贺龙给你的委任状！”李文清一愣，因为他只有一只眼看不清楚，要求钟池把那张纸拿近点，仔细看看。钟池心虚，又晃了一下，赶紧收回，嘴里不停地喊：“你要老实交代！老实交代！”。李文清明白了，这是诈骗，玩这种把戏，让李文清愤怒不已。

李文清，1930年参加红军。从战士到将军，一直是贺龙的部下。1931年春，在湖北房县反围剿战斗中腹部被枪弹洞穿，肠子流出体外，伤口用一个碗扣着，

¹ 梁斌：《何正文将军》页268，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

伤口化脓，长满了蛆，数日高烧不醒。运送伤员的人员以为李文清已经牺牲，就放在路边没有来得及掩埋。当晚，贺龙率军团机关路过，看见还有红军战士的“遗体”放在路边，就准备叫人将其掩埋。搬动时才发现李文清尚有气息，贺老总俯下身体仔细询问后，立即叫人把李文清送到巴东县万仙洞深山的农户家隐蔽，老乡的精心护理和李文清的顽强生命力，终于在数月后伤愈归队。

1932年2月刘湘围剿湘鄂西根据地，在7天7夜的浴血奋战中，李文清的右眼不幸被炮弹片击中，眼伤一直没有得到治疗并逐步恶化，到达延安后，李文清的右眼基本失明。贺龙曾向卫生部长贺彪交代，尽可能送到苏联去治疗，可因部队开展大青山战役，未能如愿。直到1945年8月，李文清已任晋绥边区2分区司令员时，还是在贺老总的关心下，住进延安和平医院，做了眼球切除手术。解放后被评为二等甲级残废。

李文清的罪名有两条：一、贺龙的黑干将。在《转战荆江南北》文章里吹捧贺龙；二、历史问题，即1931年在群众家中养伤的几个月需交代清楚。在批斗李文清的大会上，别人都在喊“打倒贺龙！”他却说：“贺龙是个好同志！”

军区副政委余洪远，1935年已是川陕苏区政府副主席。四方面军会师后，余洪远带着他的部下为一方面军筹集了几十万斤粮食、盐巴、牛羊马匹和酥油，毛主席医生骑的马都是他送的。朱老总看到这些宝贵的东西时，连声称赞他：“搞得真好！搞得真好！……不简单哟，真是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呀！”¹

余洪远为一方面军作的贡献，朱老总一直铭记在心，建国后余洪远成了朱老总家的常客。文革期间，余洪远在301住院，朱老总年近九十岁，还亲自到医院来看望他。1963年，刚从沈阳军区调到成都军区任副政委兼监委书记的余洪远，接到一个烫手山芋，军区党委要他带队到54军整风，因而得罪了54军的主要领导。1968年，当年那位被整风的54军政委已经高升成都军区第三政委，报应来了。余洪远带队参加北京学习班，没想到他自己被关进了空军学院的地下室，长达半年之久。审查他的事由是“特嫌”，余洪远是老红军，既没有被捕，也没有被俘的历史，上哪儿去当特务。余洪远参加过党的七大，作为党代表，他的历史被反复审查过，已经作了明确的结论。此一时，彼一时，谁让他得罪了军区第三政委，当年的整风被说成是“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回成都后，

¹ 《北较场风雨轶事》页121。自印书。

他被关进草堂学习班，长期挂起。后来，他通过李大章向周总理写信申诉，“九一三”后，那位第三政委也被审查。1973年，余洪远复职。

文革前，成都军区三位副司令员（不含刚调入的邓少东），何正文位列第三，排在韦杰、李文清之后。何正文的儿子何凡回忆当年父亲被打倒的原因，归结为四条¹：一是他们属于被剪除的“山头”的干部，何正文四川通江人，从红四方面军，到129师，再到第二野战军，与张国焘、邓小平沾边的人难逃厄运；二是所在军区在劫难逃。成都军区被认为是“贺龙班底”，文革前两任司令员贺炳炎、黄新廷都是贺龙麾下的干将。何正文略带遗憾地说到，1957年他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已分配到西藏军区，出发前发现肺部有问题才未成行。西藏军区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待遇可谓天壤之别；三是分管工作多，要求严，个别人乘机报复；四是军委领导来视察，陪同汇报多，文革中皆成罪状。1964年，罗总长视察成都军区，曾问黄新廷几位副司令员的分工，黄介绍：“何正文负责司令部日常工作”。罗总长不知是耳误还是理解有错，在临别送行时，他握着何正文的手说：“何正文你这个常务副司令，还要多为司令员政委分担一些工作哦！”谁能料到，文革中竟成为罗瑞卿安插在成都军区的“黑爪牙”的证据。

1970年，这批人经过两年多的审查，既没有查出叛徒，也没有查出特务，既不做结论也不安排工作，他们被分批送往13军、50军的农场继续劳动。与同期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相比，成都军区解放干部的工作远远落后。与地方上解放干部的工作也没法比，据中共四川党史记载，同期四川省管以上干部已解放90%，已安排使用79%。²

八十年代初，军区副政委余述生在301养病，晚饭后在医院的花园里散步，偶遇梁兴初，梁主动招呼余述生，说：“老余啊！那几年我在成都军区工作时，在党委会上提出过，何正文、余述生查不到什么大问题，可以解放出来，安排工作。但是，张国华政委不同意”。余述生听闻此言，没有说任何话。³张国华已于1972年病故。时过十几年了，死无对证。

一朝天子一朝臣

¹ 《北较场风雨轶事》页204，自印书。

² 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页410。

³ 《北较场风雨轶事》自印书，页281。

梁兴初刚到成都军区时，在北较场小礼堂与军区的二级部长以上干部见面，说：“我梁兴初是谁？林副主席最了解。”一来标榜：我是林彪嫡系；二来警告：不要想造我的反，我的后台硬得很。他评价成都军区的干部是“一大两低”，即“年龄大、文化低、水平低”。为此，对军区的干部进行新陈代谢，梁陆续调来一批人，分配到军区机关的关键岗位上。54军军政委谢家祥被提拔为军区副政委，一年后晋升军区第三政委；54军副政委钟池任军区政治部副主任，38军副军长李忠信任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广州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郑本炎任军区后勤部部长。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梁兴初的老部下或老同事。从资历上看，他们在红军时期是红一方面军的，抗战时期是八路军115师的，解放战争时期是东北野战军的。例如：李忠信，1938年入伍，在梁兴初任副支队长的苏鲁豫支队担任连长，朝鲜战争时是38军113师参谋长，建国后，任38军副军长。别看这些人头上有个“副”字，他们才是各部门真正的实权人物。

1970年底，陈仁琪任成都军区第二政委。陈仁琪也是红一方面军，115师、四野的的老干部。与梁兴初是老同事，50年代初，梁兴初任海南军区司令员，陈仁琪任政委。至此，成都军区的实权已完全掌握在梁、陈、谢手里，张国华政委基本被架空。

“九一三”事件和梁、陈、谢挨批

1971年9月14日，张国华接到周总理电话：“在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人，带着老婆逃跑了。”张政委将总理的原话传达给梁兴初。梁大惑不解，给他的上司黄永胜以及北京的老战友打了不少电话，对方不是支支吾吾，就是不接电话。10天以后，从中央文件上得知了林彪出逃的详情，梁兴初仰天长叹：“林彪这一跑，害了不少干部！”

11月16日，在金牛坝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揭发梁兴初的问题。此后，批梁、陈、谢成为了四川文革的新的主题。按照1972年3月23日中央下发的[1972]14号文件定义，梁被揭出五个问题：1.在庐山会议上，按照吴法宪的旨意，带头在西南大组起哄，坚持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2.违反中央规定，将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私抄回来，并给外人传看；3. 与林彪死党刘锦平等入交往甚密，4. 拉帮结派，排挤张国华，打击李大章等老同志；5. 梁兴初的夫人任桂兰，利用军区门诊部负责人的身份，干扰张国华的医疗等。

梁兴初由此被免职审查，送太原化工厂劳动，家人也搬出北较场大院去了山西。陈仁麒免职后送到兰州炼油厂劳动。谢家祥的命运好一点，没有发配到工厂劳动，从大军区正职降为大军区副职，调福州军区任顾问。

三洞桥的春天

10月，不断有林彪出事的消息传到山上。《“海校”那段难以释怀的回忆》¹一文生动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1971年10月。每天往返城里上学的娃娃们传回了“九一三事件”的消息，并以最快速度在山上，这些身处逆境的人群中传播。

目瞪口呆，肝胆乱颤。

每天都有人从城里、北较场里带回来各种相关的传闻。不管是虚的，还是实的，都是山上的人最受欢迎的，最想晓得的。

“海校”的人没有资格听文件传达，但一切都悄悄发生着变化。被遣到两个军农场劳动的老干部们，也断断续续的可以回到山上拿些生活用品，和家人小住几天了。三年多没有打过照面的黄司令员的夫人田慧琴阿姨，从西昌“五七”干校第一次回到了“海校”，带着小儿子去北京了，可以看望黄司令员了。

平时那些死歪万恶的“专案”人员的脸色、说话语气也缓和了许多，向他们反映生活中的困难，也开始尽量帮助了。工资也开始按原来的发放了……

1972年的春节前，山上罕见来了辆高级轿车，时任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来“视察”，只有专案组的人陪到转了一圈，大约是现场了解当年被吆（赶）上山的这帮人是个啥情况。据说，梁兴初还自语道：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突然的造访，立马变成了强烈的信号在“海校”弥漫——要下山了，应该下山了，必须下山

¹ 《北较场风雨轶事》自印书，348页。

了。

不久，“海校”的人终于盼来了北较场的通知：大部份搬到三洞桥军区二招待所居住，也有的家搬到了东门街居住。尽管姗姗来迟，山上人们的喜悦之情都写在了脸上。倒也是，可以离开生活艰辛的山上，更有咸鱼翻身的心情。

在两个军农场劳动的“老头子”们，全都回来了，与家人团聚。也与后来从北较场吆（赶）出来的余洪远副政委、政治部崔殿辰副主任等汇合。时隔不久，被蒙冤关押在军区华阳看守所的杨白冰也放出来，回到三洞桥家中。“老头子”们相见无语，只有抱拳相庆，大有“又见同侪并马归”的情景。

刚回到三洞桥，板凳还没坐热，就传来军区政委张国华不幸辞世的消息，灵堂设在军区小会议室。在三洞桥的部分一二级部长比较敏感，不约而同的聚在余述生家里，商议是否去吊唁。余述生最后拍板：“我带你们去。”

时隔数年，这些人不邀自去，既是对逝者的尊重和战争年代生死与共友谊的缅怀，同时也有寓意，形势变了，这帮人没问题了，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也是早晚的事。原山上的老头子们，参加张国华政委的吊唁活动，据说在北较场还引起不小的波澜。

在三洞桥没有看管了，全部闲赋在家。不远处是王建墓，坝子宽，树子多，环境蛮可以。晚饭后一家人出去散步，与山上的日子相比，轻松多了。楼前幢间的树荫下，也成了饭后茶余聚汇的地方，一把竹椅，一杯香茶，一包烟，老干部几乎天天晚上聚在一起冲壳子（吹牛）。李文清副司令员还把抄家幸存的一副象牙象棋拿出来，大战楚河汉界，悠哉悠哉。

每遇到皓月高悬，银光如洗，各家灯光暖暖地透出，心情就是舒服。都是蒙冤落难人，聚在一起，议论最多的还是“九一三”事件前后的人和事，品头论足，也难免流露出幸灾乐祸。

结束审查

回到三洞桥的老干部们，开始恢复传阅文件的权利。一天，看见一份《通知》：“副参谋长薛碧天、胡永昌，政治部副主任崔殿辰、杨白冰以及司、政、后一批一二级部长‘结束审查，适时安排工作’”。虽然，老干部们对用通知这

种不严肃的方式“平反”很不满，但春天毕竟来了。

1972年4月份，总政电话通知成都军区，叫余述生、何正文到北京。二人到京后，总政派人接机，安排住在北京的京西宾馆。总政李德生主任接见了余、何。李德生同二人是战友，一见面余述生就说：“李主任，我离开769团后，咱们有三十多年没见啦！”李德生主任说：“可不是吗！”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余述生在129师385旅769团政治处组织股任干事，李德生任排长，后任连长、营长……。他们一起奔赴抗日战争前线，参加第一场战斗就是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炸毁敌机24架。1940年初余述生从769团调到别的部队工作。李德生在769团工作的时间最长，其间，何正文也调到769团任参谋长。769团是一支红军团，从这支部队中也走出了一百多位开国将军。这支部队直隶属于人民解放军第12军，李德生长期担任该军的军长。¹

李德生对余述生说：“给我的信收到了。你们有什么要求就讲一讲嘛。”余述生和何正文分别谈了成都军区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以及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最后，要求重新安排工作。李主任听完俩人的陈诉后说：“安排你们是迟早的事，总政一定会考虑，你们也不用太着急。这几年，你们也吃了不少苦，到北京了，就多住一段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可以到301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北京的天气很热，如果想去北戴河、青岛疗养，我们总政可以安排。”的确，文化大革命以来，军队的许多高级干部被打倒了。“九一三”事件之后，这些被免职的干部都提出了重新安排工作。

北京西宾馆等待安排工作的还有陈再道、钟汉华、廖汉生、张廷发等人。大家从“牛棚”里解放出来并且又是老熟人，见面时说说笑笑，个个都心情愉快，还要开上几句玩笑：“××司令员啊！这几年干什么工作啊？”“我这几年当鸭司令员（农场放养鸭子）。”“我呀！这几年当猪司令员（农场喂猪）。”引起大家一阵欢笑。

1972年底，军区副政委余述生，副司令员何正文正式恢复原职务。三洞桥的老人也有不少陆续安排了工作。但是，还有不少“老大难”留在原地不动。

秦司令德政

¹ 《北较场“元老”余述生》，见《北较场风雨轶事》页284。自印书。

1973年7月，成都军区来了一位新司令员，他就是原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被打倒四年后，党中央、中央军委重新启用他。秦基伟是从四方面军走出来的老将军。抗美援朝时，他指挥的15军在上甘岭一战成名，在志愿军军史中写下了辉煌的一页。成都军区的老人中也有秦基伟的老部下，余洪远曾任15军政治部主任，夫人赵冀曾任15军政治部秘书科科长。

秦司令员到任当天，下了飞机哪儿也不去，当天晚饭前便坐着大红旗，带着秘书来到三洞桥军区二所余洪远的家，一进门就说：“赵冀呀，煮点腊肉，开瓶酒，包点饺子，我们来打牙祭了。”赵冀一看，连忙站起来，说：“只有黑面饺子，没有富强粉。”秦基伟大笑：“就是野菜饺子也行。”

饭后，秦司令员说：“赵冀呀，带我到院子里转转。”赵冀心里明白，这是秦司令员来给余洪远撑腰，当时的司令员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成都的总代表。赵冀带秦司令员在院子里散步，逐一介绍了院子里的情况，重点介绍了“张、杨、刘集团”中的张广恩副参谋长（因当时多数老干部都复职了，唯独张广恩的问题没有解决），并带秦司令员到了张广恩的家里，张是六安的老红军，受委屈多年，一见到秦司令员不禁落下泪来，秦司令员安慰张广恩，并了解了一些情况出来后，正好温玉成副司令员的爱人宋琬明路过，赵冀又向秦介绍了宋琬明的情况，并说她很年轻，又是军人，应该叫她上班。秦说：“温玉成在朝鲜与我很熟，我入朝时，他专门请我吃了饭，还给我介绍了四十军的作战经验。”一个星期后，宋琬明被恢复为后勤部医疗保健处任副处长。

此后，成都军区落实政策的步伐加快进行。张广恩、薛碧天任成都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胡永昌任四川省军区政委，鲁加汉、牛击、侯泽远、刘桐树、尹超凡、魏敬斋、李学厚、李漠、元青……也分别在成都军区内安排了不同的职务。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于1974年9月29日发出中发[1974]25号文《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宣布：“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

成都军区因“贺龙兵变”而引发的“四大”闹剧和痛史，终于翻过去了。❏

【评论】

杀俘虏，壮胆气

——新兵蛋子的第一课

方延曦

在《杀俘虏 壮胆气——攻陷“土围子”之后》一篇中，作者写道：

“1999年，我受命到南京组织编写部队史，访谈数百名当事人，遵照领导的意愿，只拣‘伟大、光荣、正确’的口述资料，整理汇编成册。回到北京，我的‘不掩恶’史观也回归，打开访谈笔记，原汁原味地整理出一篇血腥的故事。为了不给受访者找麻烦，我用拼音代替他们的姓名。

L（时任某旅政委）：

我们这支部队，是1945年11月初在太行山组建的。“8.15”日本投降，毛泽东看到了机遇，要我们“寸权必夺、寸利必得”。国共两军摆开了战场，

T（时任纵队副政委）：

王司令说的“祭旗”，是攻打太行山脚下的萧山镇，这是日本人长期在我们眼皮下经营的土围子。

（在战斗打响之前，关于杀人，上级就有指令）

W（时任指导员）：

萧山还没开打，教导员来给我们传话，说上头通知，三种人要杀，一是手里有枪的；二是班以上的骨干；三是穿毛衣的（石狮子给有战功的老土顽每人发一件毛衣奖励）。当土顽谁没有枪啊？都该杀。打开土围子后，我们连抓了50多个俘虏，怎么处死呢？大白天当着老百姓下手，不好看，我们决定像别的连一样，把土顽带到窑井跟前去杀。我怕新兵手发软，就让新兵三人干一个。动手前，先让副连长做示范，他在太行二分区刃刺比赛得过奖，出枪姿势好，有力度。他刺土顽时，蹬脚的同时拔出刺刀，动作干净利落。（删61字）

杀到最后，剩下个小不点，模样有十一二岁，是一个大队长的勤务兵，我想这小子不会有血债，要求连长不杀。连长向营里告了我一状，说我右倾，立场有问题。教导员来了，劝我，还是杀了吧，放出去他会到处讲的，影响不好。

正好李副连长端枪过来，小家伙腿在不停地抖动，哭喊着要回家。李副连长摸了摸他的头，然后用手在他脸上一抹，让他闭上眼，说，谁叫你当土匪的，还是跟他们一起去快活吧。他的刺刀尖没有指向小家伙的心脏部位，只在屁股上点了一下，抬脚一踹就下了井，很长时间才听到一声落地的闷响和传上来的惨叫。

H（时任纵队管理员）：

上头命令杀土顽，说是邓（小平）政委指示。……那些天，我到处转，看到部队白天黑夜都在不停歇地杀人，干部战士的手上衣襟上都是血污，开饭时，有的把自己的手在身上蹭两下，有的就用带血的手抓住馒头吃开了，我看得腻歪又心惊肉跳。

Z（某团八连新战士）：

我是新兵，刚补到连里，枪栓都拉不开，……第二天，班里分来两个俘虏，说是给我们新兵练胆，班长问我敢不敢扎，我知道要我杀人，吓得不敢吭声。班长把一个土顽脱光了衣服绑在枣树上，然后把上好的刺刀交给我，要我上。我双手已不听使唤，端着枪，闭上眼，枪尖刚顶住土顽的肚皮，再也无力捅了，班长上来持住我双手，一用力，扑哧一声捅了进去，一抽刀，血喷出来洒了我一身，土顽嗷嗷叫开了，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班长紧催我，快捅第二枪呀，我的手发抖了，还是班长上来把我，连扎了土顽的肚子好几下，直到土顽没气了。……杀土顽为什么还要土顽身上一丝不挂呢？老兵说，就是要你看到鲜血从白净的肉上汩汩冒出来，看多了，胆气也大了。

Y（时任某团副团长）：

新兵一见到土顽死前那双恐怖的眼睛，自己就先瘫了。我去看处决土顽的现场，给二连还做了示范，我对新兵讲，你不敢杀人，人家就要杀你。我拉来一个土顽，一枪刺就穿过他的脊梁，然后往下一压，空气进入胸腔，血从刀刃的血槽喷出来，我往上一挑，轻松地拔出了枪。新兵看得脸煞白，腿发颤，还是不敢上，……我让两个老兵拥着一个新兵，端上枪，要他们嘴里喊着杀声冲上去，出枪，刺！每人都连续刺了十多下，血从两条腿上流出来，刺刀红了，地面红了，新战士惨白的脸上全是汗。

D（时任某团政委）：

我们团是后进土围子的，清查时抓了土顽一百多人。上级不让白天杀。晚上，我们杀的方式不用刺刀，为了不让俘虏喊叫，就先用木棒把他们一个个打昏，给活埋了。

G（时任某连司务长）：

打进土围子后，营长要我们杀他个鸡犬不留。……埋在地里的土顽尸体，都给野狗从坑里拖出来啃咬，满地留下一片白花花的人骨。好些天，我都睡不着觉，老做噩梦。

M（旅作战科长）：

我们在大别山抓了100多地主和还乡团，带着走了几天，实在累赘，就决定干掉，我把他们带到一座山上，找一处悬崖，我让战士用枪刺挑，挑一个往沟里踢蹬一个。下面全是黑森森的树丛，不须去掩埋，我们是夜间杀的，用手电照一下，一刺刀就完事。

那一年，我们和国民党在大山里兜圈子，条件恶劣，天天行军，带着的战俘就成了包袱，凡负伤的，还要扶着架着，更是累赘，我决定一律处决。人道不人道，只有天知道。

（杀了俘虏之后，还要“取人脂”。）

Z（时任某团卫生队医助）：

那时缺医少药。一天，队长叫我去，他带我到一家大院，院里摆了五六具尸体，都是胖胖的。队长指着一具尸体说，他是萧山镇的财主，肚皮里油脂多，你把它取出来。我用小刀剖开腹腔，挖出了一大块，接着，又在其他几具死尸中挖取，足足割下来大半桶。

那几天，我就带着卫生员从尸体腹中剥离下来好几桶人油，熬制成了油膏。后来，我们在大别山打开了一座县城，抓住了伪县长。我先让几个战士给他几刺刀，我才上去撕开衣服，切开肚子取人脂。

（取人脂干什么？炒菜给战士们“改善伙食”！）

以上说的杀俘虏，还有为了解决供给抢老百姓。

Y（时任某团政治处主任）：

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把我们困在太行山区，两次出击陇海线，都被打了回来。根据地的72万军民生存都成了大问题，中央决定我们千里跃进大别山找

活路。进入大别山，第一个动作就是打土豪，目的不是为穷人分田分地，而是军队初来乍到，要吃要穿求生存。其实，大别山真正的土豪没几个，中农居多，凡有猪的，有牛的，不管成分如何？都给弄来保住我们的肚子。老百姓反感，组织起来刀枪相向，我们下到地方的工作人员被杀的不少。

大别山原本是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十多年后回来，竟成了老百姓的敌人。老百姓口传：一怕中央军，二怕还乡团，三怕共产党。尽管这一左的政策只有三个月，老百姓心目中的红军形象已大大丧失，直到淮海战役胜利，老百姓对解放军才开始笑脸相迎。

B（时任某团宣传股长）：

我们刚进大别山，要生存，什么人的利益都可以去侵占。到一个地方，把老百姓抢个精光，吃个精光，人家就跑到山上去骂我们，说跟日本鬼子进大别山一个样。你骂你的，我干我的，看到哪家房子好，就进去搜刮，有米就煮，有猪就杀。我们团长穿了件日本军大衣走在大街上，一个老百姓以为他是中央军的长官，跑来向他报告，老总，我们刚抓到一个共产党。团长一听，抡起马刀就把这个老乡砍下半边脑壳。

请读者原谅我引用了这么长的原文，其实已经删减了许多。实在是没办法，不这样做，读者怎么可能领教那么血淋淋的真相！

以上内容，如果不是作者在离世之前斗胆披露出来，就会被他永远带到地下去了。

作者在书稿《后记》中这样写道：

“初稿落笔，虽系受访人的实话实说，仍忧惧文字风云的不测，敬请几位朋友斟酌指正。一位熟知军史的长者，毫不留情地指责我离经叛道：‘为什么要这样写？’‘你这是反党乱军！’另一位是70后的军旅作家，疑惑：‘我军哪会有这种事？’‘难以置信。’

“我军滥杀之事，是不会被记入史册的，仅在几部回忆录中略有披露：1930年代初，两次清除莫须有的‘AB团’，毛泽东率先杀掉红四军干部战士1800；鄂豫皖的张国焘，整肃红四方面军干部2500多；夏曦在湘鄂西杀的只剩下6个共产党人（三个苏区就杀掉11万人）。红军仓皇长征，行动路线保密，邓发下令，把数以百计走不动的伤员一律处决。残杀自己的人手下都不留情，何况

杀的土顽是日伪蒋帮多重的敌对身份。

“我的访谈者对这段史实的叙述，都无顾无忌甚至是理直气壮的，认为军队就是开打仗铺的，杀人是阶级斗争的需要，土顽罪有应得。在战争年代，当事人都有卓越的功绩。建国后，有的已是大军区、军兵种的司令政委，有的转到地方当上了国防工业部门的领导人（其中三位政治局委员，三位中央委员），一般的也位居军师两级的中高层，他们都是我尊敬的前辈，我既不能回避不光彩的历史，又不能把已去天国的魂灵拉回来接受当今文明社会的‘洗礼’，只能隐其姓、埋其名地就事说事。我要告诉公众的是，这场反人类的屠杀是党的意志，是党在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上留下的遗迹。”

读毕以上文字，疑问就出来了：不是从红军建军时期起，就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不是讲“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吗？可《背后》告诉的我们的历史事实完全相反。

战时杀俘虏已经是违反军纪了，但还是会有辩解的理由：两军对阵，你死我活，杀红了眼，管不了那么多！

就算这理由能够成立，和平时期杀人怎么解释？

和平时期杀人打的旗号是“所谓‘肃反’，杀的是什么人？就是那些早已放下了武器的过去的敌人。1949年至1968年中共建政已经快20年了，到了文革还杀，所谓“清理阶级队伍”。

难怪民间流传这样的说法：“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这些说法反映的确实是一个荒诞的事实，说的是反革命越大，得到的好处越多；反革命越小，越难逃脱被杀的恶运。

这里牵涉到中共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说“法宝”一点儿不过分，中共之所以能取得政权，“统一战线”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策略确实功不可没。但这个“统”，只“统”那些官级高的，“县团级”以下用不着“统”，基本上都杀了。

事实上，在1957年伟大导师发动的“反右”运动以后，这个“统一战线”就名存实亡了，这次运动打了上百万的右派，造成多少人家破人亡。

这不算完。1966年开始的文革又继续杀人。北京市大兴区几天之内竟杀了上千人，年龄最大的超过80岁，最小的才38天，22户被杀绝。杀人方法五花

八门，残忍之极，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有活埋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

被杀者犯了什么罪？就因为他们是地主、富农，或者是地主、富农的子弟。杀人是在共和国的首都啊！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啊！

在这之前，时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都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建立感情，提供给他们情况，把黑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接到大兴县杀人的报告后谢富治竟然飘飘地说什么：“杀了就杀了，不要追究了。没有被杀的，就不要杀了。”

事件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1966年8月18日伟大导师在天安门上检阅红卫兵时，对给他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女红卫兵说：“要武嘛！”

听见没有？最高统帅都下令了，“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从此，“红色恐怖”笼罩了全中国，死人无算！

这之后，伟大导师又命令军队“支左”。军队在所谓“支左”中支持武斗又杀了多少人？没有统计。

文革结束后，据叶剑英元帅说，文革中各种死亡超过1000万人！

当年红卫兵杀气腾腾地高喊着“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人杀的真是不少，可这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离我们口口声声要建设的“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美好世界”是更近了，还是更远了昵？

笔者始终想不通：历朝历代新皇帝上台，总要搞什么“大赦天下”，目的当然是为了收拢人心，可人民的政权怎么反其道而行之呢？想不通！

在我们生存的土地上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悲剧？拼命想为这种历史悲剧找出它得以发生的理由，能想到的浅显道理是：如同人不能说谎一样，说一个谎，就得再说一千个谎去圆第一个谎；杀人也不能杀开头，杀一个无辜的人跟着就可能去杀更多的人！

现代社会不能把未经正当程序杀人、特别是杀害无辜者的恶行披上“正义”的外衣。（此处加一段）

法国作家雨果写过一本小说《九三年》，写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书中有一

个贵族朗德纳克侯爵，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孩子。人们从他身上看到的是人性的高贵。可是在革命辞典当中，他是反动贵族，他是敌人！对他正面评价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反动透顶”！必须“彻底批倒批臭”！

可是，对当年抗日战争中聂荣臻元帅救济日本小姑娘的事迹怎么看？

经历了那么多残酷之后，我反复想：在革命之上，有没有一个超越革命的更高的东西？如果有，那只能是人道主义。

此处为什么要突出说到“人道主义”这个曾经被批判了几十年的概念？因为这实在是一个无论如何都饶不过去的重大问题。还记得文革前我们在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每天的课程与报纸电台对“人道主义”的批判连篇累牍，日复一日地批判所谓“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恨不得把人道主义骂成十恶不赦，结果人与人的关系真的成了所谓“他人是地狱”。当时就十分不理解：人道主义怎么成了罪恶的渊藪？成了革命的死对头？

而那些批判者自我标榜为“马克思主义者”，可难道他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就是人道主义？

1983年，曾被称为“文艺沙皇”、紧跟伟大导师迫害过许多文化人士的周扬晚年痛定思痛，有所悔悟，写出了一篇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文章，其中谈到马克思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竟然被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被迫检讨，抑郁而亡。

可怜的人道主义，如今已经成了人与人之间残存的唯一一点温暖，是我们心中残存的唯一一点光亮。没有它的支撑，我们可能连苟活下去的那一点点勇气都不存在了！

太多的血腥，让任何一个良知尚存的人——假若他还配称为人——没有办法面对那些对良知的拷问。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骇人听闻的罪行？难道跟我们在过去年代里滥杀无辜没有关系？过去的罪恶不清算，明天的罪恶必定会加倍发生！

写至此处，我的可怜的记忆力又来折磨我，让我又想到了伟大导师曾说过的一句非常英明的“最高指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

话说得还能比这更漂亮吗？

文革前，伟大导师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元帅命人编写了一本被称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发行了数亿册，全国人手一册“天天读”。我忽发奇想：如果能再编一本对照版的《毛主席语录》来教育全国人民，那该有多么好！

有史料记载：1949年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第一次出国去朝拜苏联人民的伟大导师斯大林，当他刚一张口诉说委屈时，斯大林即打断他的话说：“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

这话什么意思呢？斯氏这样说，当然是为了平息曾经在共产国际那里受过委屈的毛泽东的抱怨，但话中同时透露出十足的狂傲与霸气。斯氏确有如此放言的底气，因为就在他的手中，几百万、上千万条生命悲惨死去。而毛氏呢，也当得起这句话，因为在毛的手中，同样也有成百万、上千万个生灵死于非命！

在人类进化的漫长历史中，“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这句话是天经地义的真理。谁杀的人多，谁掠的地盘大，谁就是王者。但是今天，在文明人的头脑中，这句话不过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狡猾说法。

即便经过了伪装，这句话听了还是让人脊背发凉，而你若是看了《背后》的叙述，那反应就强烈得多了：惊骇、恐惧、愤怒、……种种感觉会一齐扑上心头，甚至压得你喘不上气来！

关于杀人的“正当性”，还有比斯大林说法更直白、更气壮的。

有史料记载：在一次关于法国雅各宾党专政垮台原因的讨论中，普列汉诺夫同志玩笑似的说了一句话：这个专政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多了。

话音刚落，普的学生列宁抬起眉毛，十分严肃地反驳他的老师：“雅各宾党共和国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少了。”

说过这话的11年之后，1917年俄国爆发所谓“十月革命”，言行一致的列宁说到做到，砍下了成千上万的脑袋。斯大林继列宁之后也不遑多让，砍下了更多的脑袋。

这之后，就是我们中国，砍下的脑袋绝对不会比俄国少。

再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凡红潮浪峰所到之处：东欧诸国、朝鲜、越南、古巴、……无一不是人头滚滚，……

“你诬蔑革命！革命是无产者盛大的节日，只有反动派才会为失去的天堂哭泣！”眼睛一闭，就仿佛又听到这种义正辞严的大批判话语。

可是面对这数以几千万计不是死于天灾而是死于人祸的无辜亡灵，还能够说出这种话的人该有多么冷血！

饮人血而狂欢的节日是什么人的节日？

人命关天呀！我们中国的老传统尽管被批得臭不可闻，至少也没有把人命看得那么一文不值、死了活该吧？

别说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的试金石了，对人的生命的态度就是人与非人的试金石！

对那些“非人”根本无须反驳，因为他们要么是愚蠢下贱到了骨子里，要么本来就是凶残杀手的同类！

俄国于苏联解体后，为在列宁、斯大林当政时期的受难者建立了纪念碑，碑身上一一刻下有记载的死难者的姓名。

我们这里呢？有谁还记得他们！

【域外见闻】

我眼中的新加坡（2）

——小坡的移民与疫情

于向真

2015年春节以来，我多次到新加坡暂住。这次是2019年6月3日离京，因新冠疫情，原定2020年春节后返京却延宕至今，对国内亲友颇多惦挂。

在坡数年，耳闻目睹，感慨良多，这里用《我眼中的新加坡》向朋友们汇报一下，上次说了“新加坡的衣食住行”，接着说“新加坡的移民”和“疫情中的新加坡”。

新加坡的移民

2011年，我儿子儿媳成家已多年，当他们表示“打算要个孩子”时，我当即建议“出去吧，对孩子有利。”儿媳问为什么？我说“孩子在北京上幼儿园，念小学、中学诸多关口，没关系都很难办。”儿媳奇怪“你认识那么多校长，怎

会没关系？”我说“我不擅长拉关系，再说跟我熟悉的校长都面临退休了。”儿媳说“你儿子不愿去欧美。”我说“可以去其他国家，比如亚洲某地。”儿媳就把简历投到新加坡公司，半年后去新加坡打工，儿子后来跟过去，一晃也八九年了。第一代出去打工的移民都不容易，儿子儿媳放弃了北京的舒适环境，到外面从头做起，一步步在异域立足，4年后获绿卡、再2年后入籍，属于典型的技术移民。

有孙辈后，我和老伴儿过来帮着照看孩子，几年下来也结识了一些大陆来的朋友，他们的子女是以往大陆各省市高考一二名的学霸，获全额奖学金来坡读名牌高校，毕业留下成为新移民，我管这种现象叫“掐尖抢人才”。新加坡80后的大陆人中多数是留学移民，政府每年从大陆高考中厘选尖子生，给与优厚奖学金挖过来送进名校，毕业后工作半年就可以拿到永久居留证。随着国际间人才争夺加剧，2017年起在新加坡只要通过一门国家考试的留学生，就能获得绿卡，可以说是大开绿灯了。每天晚饭后，我带小孙孙到楼下玩，时常能碰到三两个在附近上国际学校的小留学生，念小学的他早早就被父母送过来读书，为的就是走移民捷径。

新加坡还有一类是投资移民，富人挟巨款转换国籍，属于财富移民，新加坡这边不仅有大陆富豪，也有英国、印尼等多国富翁来此开办公司并购置豪宅。2020年新加坡十大富豪中有三名来自大陆的移民，第一名是因疫情导致呼吸机大卖而暴富的深圳迈瑞医疗公司董事长李西廷，第二名是去年2019首富海底捞老板张勇夫妇，第七名是天津籍电商李晓冬。

同院有个邻居老家在内蒙古，原是我国一名出色的运动员，来新加坡打球被留下，运动生涯结束后与一名从事运动医学的新加坡本地博士后医生结婚，她家小孩和我孙孙同龄，我们两家经常周末一起出去玩。她属于占比不多的运动员移民。

早在19世纪，新加坡已是各民族聚集的城邦，那时最多的是为逃避家乡贫困而渡海南下的福建和广东人，如今华人依然最多，占总人口的75%，还有马来人、印度人和欧亚人。新加坡为保持特色，政府在批准移民时是有明显尺度的，同样来新从事相似工作，马来人容易的多，印度人在绿卡获批上难度较大、时间也长。为促进宗族间的融洽，各祖屋和公寓住户的数量也被按照相应比例入

住，比如我儿子现在的住房是从一户印度人手中过户的，买房时，因华人在这个公寓里的比例尚有空额，我儿子儿媳才能购买。

近年新加坡稳步发展，吸引越来越多投资移民，比如三年前市中心最贵的顶层豪宅被英国富翁戴森卷发棒的老总詹姆斯·戴森买下，同时他把公司和工厂也转移过来。当然，如今有钱人来坡投资最多的当属大陆富豪。

我的感觉，新加坡深知自己的短板：国小人少老龄化，所以非常积极地引进人才与劳动力。目前住在客工宿舍的外籍劳工有32万，他们大多来自中国大陆、印度和孟加拉，从事建筑、保洁等工作。很多公司白领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高学历者，在金融、IT、教育领域占很高比率。新加坡老龄化同样严重，政府大力鼓励年轻人生育，不仅有丰厚的奖励措施，还不断引进家庭服务人员，我看到有老人、幼儿的大家庭，家务活基本都依靠雇工，就是驰名全球的菲佣。其实新加坡的家庭雇工不仅来自菲律宾，还有不少来自缅甸、印尼等国，她们在外籍劳工中约占15%。

近日，新加坡媒体披露一个数字，疫情使外籍劳工入境受阻加上隔离停工回国，2020年10月人口统计比去年570万减少了4万人，引发有识之士对人口稳步增长对抗老龄化加剧的忧虑，据说新加坡总人口的目标是1000万，任重道远，差距还相当大。

我来新加坡几年间，不止一次听到大陆移民发自内心的感慨：这里是最适合中国人居住的地方。我总忍不住追问“为什么？”答案离不开这句话：“在新加坡生活，几乎感觉不到自己是外国人。”

疫情中的新加坡

今年8月9日是新加坡建国55周年国庆日，那天晴空丽日，空中三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拉挂着一面国旗；F16战斗机群飞临各大医院上空，向抗击疫情的医护人员致敬；先进的装甲车、坦克、炮车列队从各主要邻里中心驶过，接受普通百姓检阅；晚8点，小岛上空分10个观看点燃放节日烟火，许多人透过自家窗前就能观赏到璀璨的礼花。

国庆期间，新加坡各家华语媒体争晒55年岛上发生的巨变：最自豪的成就体现在住房上，55年前新加坡还是贫穷小渔村，人均住房面积不足6平，如今

人均住房面积 30 平，居民拥屋率超过 90%。55 年前，李光耀立下军令状，定下第一个 5 年规划：盖 5 万套房子，55 年来政府已经足足盖了超过 100 万套组屋。当年英国治下花了 30 年在新加坡建了 2 万套公共住房，从英国人手中拿回建屋权后，李光耀带领建国一代创造了“居者有其屋”的奇迹，成为全球争相效仿的民生奇迹。

再看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55 年前新加坡就业率奇低，经济落后，产业单一，如今有超过 4200 家全球企业区域总部云集于此，成为亚洲金融中心。说到安全与环境，55 年前，贩毒、盗窃、抢劫频发，黑帮组织横行，如今新加坡成为全球最安全城市之一，夜不闭户、离家不锁门没有问题。55 年前，新加坡公共卫生很差，街道上满是垃圾，如今新加坡成为举世瞩目的花园城市，干净整洁优美。

媒体罗列这些，我理解是借国庆佳节鼓励全岛民心，因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小岛国造成难以估量的重创，截至

10 月 20 日，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高达 57921 人，最集中的感染群体是住在集体宿舍的 32 万多客工，染病率高达 16.15%！

严峻的疫情形势让新加坡各行各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把逐日腾飞的经济拖入建国后最大衰退期的泥沼。新冠疫情持续冲击新加坡下滑的经济，裁员减薪大潮来势汹汹，仅上半年就裁员 12.9 万人，并有 15 万员工被减薪 25%。进入 9 月中旬，有人说冠病疫情让新加坡的经济“一朝回到解放前”，有人在网上大声疾呼：疫情再不缓解，所有中小企业将全军覆灭！

早在 2 月 28 日，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在国会上宣布：所有部长将减薪一个月！国会议员减少一个月的津贴。哈莉玛总统也减薪一个月，高级公务员减薪半个月。新加坡“巨无霸企业”淡马锡、凯德集团先后宣布，从 4 月份开始施行降薪措施，并持续到全年。中秋节前，新加坡 6 所公立大学的校长、副校长等高级职员也都开始减薪，减薪幅度参照公务员的减薪标准。

新加坡政府现有 8500 名公务员，11 月 28 日宣布因疫情原因，今年不给公务员们发例行的岁末花红了，但是有 2400 名低薪公务员将受到政府照顾，他们会收到一笔一次性 1200 元（约合人民币 6000 元）的补贴。

新加坡经济支柱之一的新加坡航空公司宣布裁员减薪计划，削减旗下三家

航空公司约 6700 个职位。新航高层加大减薪幅度至 30% 至 30%，包括机师在内的大部分员工则强制休无薪假，有上万名员工受影响，媒体报道过有些空姐自愿到医院当助理护士，也有空姐客串快递员，有买家开门见到超靓美女很惊讶，追问后知道送货上门的是赋闲后改行的空姐，于是在脸上分享趣闻。

政府金管局表示，今年国内生产总值严重萎缩，比 2008 年金融危机中的最高萎缩点还要严重近 3 倍！第二季度新加坡服务业、建筑业环比去年同期萎缩约 40% 至 50%。新航集团的财务状况，反射出新加坡空前严峻的经济惨况：2020 年非但没有盈利还持续严重亏损，平均每天亏损 1.2 千万新元（约 6 千万人民币），有人形容“纸张粉碎机都达不到这样的烧钱速度吧”！

据新加坡官媒报告，2020 年 1 月新加坡平均薪资为 5783 新币（约合 28900 元人民币），一年前 2019 年初平均月薪是 5596 新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新冠疫情，新加坡的平均月薪原本会继续走高。但截止到 2020 年 7 月为止，平均月薪回落到 5276 新币，下半年继续回落，预计明年薪金收入仍会保持下降趋势。

截止 10 月 20 日，全球感染人数已经直逼 4000 万，这场疫情全球遭殃，损失大到目前还无法计量，小小岛国的经济陷入比预料严重得多得多的、一波接一波的困局，其他地区与国家的损失可想而知啊。

习惯抱着“向死而生”信念的新加坡，在采取最高级别的防疫措施的同时，不得已动用了 20 年的国家储备金约 1000 亿新币用于补助重要产业和民众生计。与此同时，李总理也是以大家长的身份，安抚国人“钱够花”的同时，告诫国人不要抱着“富二代”的心态去挥霍先辈辛苦攒下的储备金。

新加坡政府不惜代价，动用了 20 年的国家储备金用以帮助企业 and 民众度过难关，从 3 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各种政府补助轮番进行，确实让一部分企业和员工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让家庭得以维系。补助类型包括所有重点行业，如旅游业、航空业、建筑业、海事工业，以及石油化工业等共计 15000 多名业主，同时为普通民众发放了各种薪金补贴、就业入息补助、孩童幼儿园学费减免、水电费回扣、房租减免等，连部分外国人都获得补贴，比如给长期工作签证者和客工发放了薪金补助，还减免了客工外劳税等。近期政府给每个家庭发放了 3.2 亿新币的旅游消费券，刺激国内旅游业。疫情以来，政府多次给所有人，包括我这样的客居者免费发放口罩，让我一次次心存感激！

新加坡重视科技，疫情中儿子给我们手机装了“合力跟踪”应用软件，类似大陆的“健康码”，进出公共场合无需再刷身份证，只要身边有人确诊感染，能迅速得到通知。

疫情给小坡造成巨大挑战也带来机遇，海外资产开始加速流入新加坡，新加坡金融管理局9月中旬公布数据：今年非居民存款跃升44%，达到创纪录的620亿新币（约合3100亿人民币），是自1991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不久前，新加坡被列为2020年全球最佳投资或经商国家第一名。全面开放的经济贸易政策和严明执法的治国理念，是全球投资者所寻求的安全稳定的投资环境。继阿里巴巴之后，中国腾讯、字节跳动等都陆续在新加坡开设了总部。

新加坡政府已经将疫情后的产业转型问题摆在桌面，正加大在科研创新方面的长期投资，未来五年的科研发展计划呼之欲出，计划拨出超过200亿元支持基础和应用研究，特别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气候变化等科研项目。让许多人庆幸的是政府在五年前就开启了企业转型工作，促进企业和工会携手合作制定出产业转型蓝图，并切实协助国人掌握新技能，找到新工作。今年6月，我儿媳在网上进修了一门管理学，考试合格后很快取得证书，她只出力没出钱，费用是由政府补贴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不小心就有可能失去性命的新冠大流行之下，新加坡的死亡率始终保持全球最低，57901例中28人死亡，只有0.05%，而世界平均死亡率是3%。

最初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新加坡政府从误以为是“非典又一波”而轻敌，不久后两位部长和李显龙总理在不同场合讲话时都曾哽咽流泪，政府官员对起初因口罩缺货发表过“有症状者必须戴口罩，无症状的人可以不戴口罩”的失当言论公开赔礼道歉。2020年9月，一方面经济滑坡、失业率大增，另一方面新冠疫情有效被控，获得国际社会好评，新加坡不失时机购买到疫苗使用权，为鼓舞民心，李显龙总理呼吁：“不要怀疑，不要害怕，星耀樟宜会重新闪耀，樟宜机场会重新蓬勃，新加坡航空公司将会再次启航，我们的经济会再次繁荣，我们的子孙也将继续迈向更公平、平等的社会。”天佑自助者，新加坡的明天会更好！下次我说新加坡的教育和严刑峻法，再见。🇸🇬

【述往】

北师大文革变奏曲

安希孟

我自幼就继承了红色基因。小时躺在被窝里听大人说斗地主（不是玩扑克斗地主）吊打地主，地主老爷屁股拉下屎。我“噗嗤”一声笑，就开始了革命、战斗的一生。“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嘹亮战歌发自深喉。

我们从学生时代起，就自觉按照阶级斗争观念和方法形塑自我，自幼就希望邻居地主婆偷摘集体地里辣椒，我和她斗争而被掐死——但村里没有辣椒地，也没有地主婆。父辈按照斗争理论规范我们。我们中间，没有绵羊，只有老虎。没有思想落伍、温情脉脉的人。我们时时“下乡”，但其实本来我们就在乡下。乡下人“下乡”，就是荒诞剧。山上人“上山”，就是滑稽戏。我们本来就劳动化，却还要更加劳动化。我们本来就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却偏偏冒充精神贵族和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还要更加迈向体力劳动。我本来是没有知识的乡巴老，却还担心“懒馋贪占变”，担心自己知识越多越反动。人格分裂，心口不一，言不由衷。我们中没有人保守恋旧，没有谁比谁更保守，更温和，只有谁比谁更激进、更昂扬、更奋发、更猛烈。没有落后、温情和保守，没有异议——如果说有异议，那就是指斥别人不该有异议。最“落后”的人，反倒是更激进的人。不是先进整右派，不是权贵斗落后，反倒是“落后”斗先进。

我一直批评极左派，同情右派，哀矜弱者。但其实，就人的劣根性言，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大部分人，都曾经是左派或仍旧是左派或是潜在的左派，都浸润左的思潮。文革惨烈是全人类，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劫难，那不是解放全人类，而是幽囚全人类及其人性。或者说，我们自己幽囚了自己，自己送自己上断头台。人有自杀自虐的本能。

我虽说是西方哲学和宗教哲学教师，但无法与国际学术对接，只是翻译、读顺、介绍、叙述，没有个人独到见解和建树。几十年岁月，无穷政治风波、社会运动、劳动锻炼，生活艰辛、人际不和，占去生活大部，读书受限，被批判书籍束之高阁，不同观点或域外书刊被封锁。不仅我这一代人，上辈与下辈知识人的学术储备，语文素养，都大打折扣。几千年中西地理阻隔，传统思维

定势，文化观念，民众心理积淀，都阻碍我和我们在西方哲学与神学研究方面的发育。我特别不愿意谈论自己和学生的创新、独到见解和贡献。我的口头禅是：看西哲书，自己能看懂就不错了。能阐释清楚，就阿弥陀佛。我的“论文”，说穿了，只是译介。仅此而已。

造大庆展览的反

造大庆展览的反，我们去国家经委静坐，也就是白天回来，晚上去静坐，占领人家办公室。在沙发上睡觉，腿抽筋，疼得哇哇乱叫。至于大庆展览究竟怎么了，我真的莫名其妙。当然后来知道是因为挂了刘少奇的像。这是嘛问题呀。我们国人认为，这芝麻大的事儿会亡国灭种。就这么着，惊动了上层。有一天晚上，迷迷瞪瞪，忽然领导来了。大家奋不顾身涌向会议室。我还有点睡意朦胧。那时候听说中央办公都是在晚上。戚本禹、陶鲁笏、余秋里来啦。显然级别最低的戚本禹比他们威风，也是我们瞩目的明星。戚大帅穿着军大衣训斥陶鲁笏，好像老师训学生。他们都恭维戚大帅。余秋里忙不迭地推卸责任。但不久就有大字报说他也有不该推诿的责任。

戚本禹讲话很快风传大江南北。不久王关戚倒台，原说“左派整风，三年以后”。不料风头太盛，整天名声如雷贯耳，又不知自持，就成小爬虫——因为纱帽小。纱帽大一些的，就被叫做变色龙。龙比虫大。

我们曾经负有重大使命。1966年12月冬，寒风凛冽。有一天晚上，忽然接到命令，说中学“联动分子”要南下广州逃亡，“他这是想逃哇”。我们奉命到北京火车站抓捕。在万头攒动的候车室里，我们仔细检查每一个有可能的人的嘴脸，大概年龄不应该是七十老翁或豆蔻年华。结果扑了个空。

1967年春，北师大井冈山公社得风气之先首着先鞭，成为反“二月逆流”之嚆矢。所谓“二月逆流”，就是几个老师老总在生活会上发表不同意见，几句牢骚。反击，就是谁也不能发表不同意见。结果文革派霸王别姬。不让人讲话，天就会真的塌下来。据说那是“旧政府和新文革”之间的矛盾。也有说康生是北师大后台，江青陈伯达是天派后台。这都是无稽之谈。反击“二月逆流”从农林口反谭震林开始。进驻农展馆的是我们班的老牛。后来我参加中央各部联合调查组，就是整几位副总理的材料。要知道什么是欲加之罪，看那时候的作

为就知道七八成。古今往来，都那么回事。

我被组织派送到社科院联队和北师大“中央各部联合调查组”（这名堂很吓人），认得了世界宗教研究所几位兄长，对一向厌恶的基督教有了理解，这为后来投考基督教研究生埋下伏笔。起初的观念是彻底批判宗教鸦片，守护社会主义，击碎资产阶级阴谋。后来才知谈何容易。在北师大和国家经委之间来往，有一次挤公交车时，我和陶鲁箴挤在一起。他可曾经是我们山西的父母官。他个子矮胖。能闻到他头发上的头油味道。显然他没有了小汽车。奇怪的是，陶鲁箴后来竟然成“四人帮”的人。中央各部联合调查组这名称很大，背后是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三人用“撒人兴”（即三人行）的笔名在《新建设》和《哲学研究》发表文章。在国家经委楼道里，经常见到打扫厕所的曾经的党组书记张闻天。他为我们服务。1959年之后，他搞经济问题研究。

“海派”由来

所谓“南派”，指的是1967春天，井冈山战斗团一些人发布声明（声明些什么，我一直不清楚），大字报贴在大字报中心区（物理楼前一条路）路南。后来这派叫“南派”。因为北师大重点大字报，总也人头攒动，我挤不进去。但我知道这派属于井冈山内部对立面反对派。我觉着有反对派是掌权者的福分。

谭厚兰一派，继而在大字报中心区路北也发表联合宣言，叫“北派”。北派应当是谭厚兰派。理论上，南派应该是樊礼跃、黄家林、李五全一派。谭厚兰一派因为受林杰支持，所以其对立面一直翅膀硬不起来。

北派，后来杆派，铁杆支持谭厚兰。北师大杆派著名战斗队有中文系青年教师老挺（《挺进报》战斗队）、政教系青年教师队伍《红梭标》、外语系青年教师组织《外教联》（外语系教师联合战斗队，队长是青年教师刘乐亭）。学生队伍，外语系《瓦西里》战斗队，曾用“钢一连”等名称。主要是刘树林同学捉笔，起初叫《红色鱼雷》战斗队。还有个名称叫“缚苍龙”。外系有人大字报戏谑称其为：“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臭龙·契卡夫”。似乎也有建言应加尼古拉也夫斯基，成“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臭龙·契卡夫·尼古拉也夫斯基”。挺逗人的。

1967年九月七日，北师大发生了一次震撼世界的“政变”，几个热血青年一算计就宣布推翻革委会——你能推翻省委省政府，凭啥我就不能掀翻你？这是

全国第一起推翻革委会的事。这就成了反革命事件，上头连下三道急急如律令，逮捕了仨人。后来被逮捕的几个人的党羽成立了《大海航行靠舵手联合编辑部》，很奇怪又很长的组织名称，有点像共产国际工人组织、国际工人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现今红透天的中二张梦阳君发起，于1967年12月寒冬发布共同宣言（联合声明），剑指北师大革委会谭厚兰。（由此得名“海派”。这一派的底子是1967春天的“南派”。）几十个战斗队联署。我们原本没有稳定的战斗队，有一个名义上的战斗队，也是过眼烟云。我取了个名叫《云水怒》，署名《井冈云水怒》。为了壮声势，自己又虚构了几个子虚乌有的《井冈XX》，《井冈XX》战斗队，以壮雄威，好像现而今大跃进似地XXX劳工团，XXX社会党，XXX农运组织及其报纸文章，其实可能就俩人。子虚乌有的XX“皮包公司”。

吻你——我们和“苏修男特嫌”过招

特嫌，特务嫌疑，就是罪犯。疑罪从无，这是帝修反搞的那一套，不管用。1968年工宣队进驻北师大，教师学生混合编班，也叫“教师下班”。我们班原一班拆解为两个班，每十个人一个班，另外添加十个老师。我是班长。教师中耿志国、于传增、濮阳翔是被原革委会清队审查的，我们接过来。他们的问题由专案组内查外调。我们没有为难他们，只是对耿志国轮番轰炸，穷追猛打，要他交代苏修“特嫌”问题。因为他有个太太是苏联人，文革伊始，就回到苏联。这哈儿耿治国就有交代不完的罪行——我猜想，在苏联那厢，他老婆就有交代不完的中国“特嫌”问题。

耿志国的苏联婆姨每次来信都有系里工宣队收取审查，先让王照碧老师给工军宣队翻译。信的末尾是俄语“吻你”。我们班的女同学脸蛋绯红。（后来那位女同学的男友写情书就用英语kiss了）。

耿志国和其他娶了俄国女人的人有事去苏联大使馆，这是怀疑他是苏修“男特务”的凭据——不知道那时候怎么那么缺乏自信。

耿志国是河北红小鬼出身，照说见过惊涛骇浪，也收拾过别人。按理，冤枉几个人有嘛了不起？但他每次拿狼和小羊的故事说事。我们就迂迴作战，不说他罪证本身，只说他污蔑革命群众是“狼”。单单这条罪行，就够枪毙了。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态度不好，就是反革命。所以，顽抗到底，死路

一条，他必须也应该承认就是苏修或苏绣特务。如今法制，允许抗辩，允许申诉上诉，允许律师辩护，允许沉默，态度不计分。不过耿志贵应该比我们更革命进步，怎么就轮到咱们成了革命斗士呢？

濮阳翔青少年时负气离家出走，参加抗日队伍忠义救国军。这当然使人想到他是胡传魁部下——这还得了？他一个娃娃，没去过春来茶馆阳澄湖畔。这没事。

他另一个问题是四九年易帜前夕据说参加“三青团”。濮阳紧张得不得了，可这算什么问题呀。还有就是文革前他在《文史哲》发表过批判大毒草《早春二月》的文章。这算香花呀。他也是红色文人，怎么也挨批呢？

他每天找我，口念“班 zang”，同学们都笑我，我“老脸”也红了。后来清查造反派“五一六”问题，他就成了狱卒兵弁，为被关押的阶级敌人造反派小头头打饭，成了骨干和依靠力量。再后来，教授、系主任、兼职代课、创收、编字典。政治斗争走马灯，你方唱罢我登台。我经常找专案组说，他可以解除审查了。后来他的儿女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炼红心，一心一意干革命。系里破格让他回家送行。他解除审查后，高兴地请我们仨吃饭：西葫芦馅包饺子，因为水大，几乎全破了。他自嘲地说，就算吃面片汤吧。北京地铁修好后，他儿子从延安插队回来，他让我们俩坐地铁玩儿。地铁车票一角，不出站，可以来回不停地无休止地坐呀坐呀地坐。地铁，那是林彪主持军委工作的备战杰作。

文革中挨斗挨整的人，有历史问题的人，一旦复位，其骨子里依然是基本路线“年年斗”，其整肃造反派的热情毫不逊色。北师大辅导员、党政干部，把“反动学生”刘希贤送到农场劳改。文革一来，遭学生狠命批斗，几被整死，但初心不改。运动中期回系，整斗别人，一口一个“竹筒倒豆子”。每次发言，一套一套，琅琅上口。我的朋友濮阳翔，三青团，有小小历史问题，被“解放”解除隔离审查，整董连猛、凤泉林，也是披挂上阵，一马当先。

我实实在在地说，文革作恶的绝不是四个人，万千群众你我他都曾经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没有右派的社会

几十年间，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都是自来红。自己个儿拼命往红堆里

扎堆。大家的面孔是红的，心也赤诚。在北师大，可悲的是，没有“右”派，人人皆左。左比“右”好，笑比哭好。整人比挨整好。穷比富、下比上、出身坏的比出身好的、没钱的比有钱的、没知识的比有知识的、丑陋的比美丽的、工资低的比工资高的、非党团员比党团员，更左，更激进。被打成“右”派学生的，如果掌权，同样会把同寝同窗弄成“右”派。社会被动员起来，下层恨恶上层。一个没有“右”派的社会，没有反向作用力的社会，好比没有刹车手闸，没有减速档，没有遮阳帽，只有加速的车辆，行进在只有上坡，没有下山道的陡峭山崖，是危险的。几十年的阅历，知道了，周围周遭周边，连同我自己在内，其实没有“右”派，都是左派。我班落后分子，比如我自己，皆左派。刘少奇工作组抓“右”派，那些假左派，其实是真左派，假“右”派。

北师大李文博鼓吹“公社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北师大新思潮被政教系马列主义老师打成“无政府主义”，金猴说中央领导“也有剥削”，这都挺符合当时高层意向。不然什么是特权阶层和资产阶级法呢？但她被打成反革命——其实她是左派。他们不是假左派，而是真左派，极左派。要他们清算文革，等于让老虎吃素食。结论，几十年间，举国无“右”派。全员左派互斗。嗨，你还别说，五七年不少“右”派，真的其实是左派。我的老师，哦，资产阶级“右”派章罗，不就曾经是资产阶级左派吗？胡风，左翼作家！！吴晗，左派。

1968年英二年级抓了一个反革命吴振明。什么反革命呢？原来他就是革命分子——文革前学习刘少奇《修养》很用功，在书上写了点批注感想，密密麻麻，分明是革命者，而不是反革命者。吴振明马列书读多了，也有点儿清高，被班上同学羡慕嫉妒恨，这个三代老工人红四代被打成反革命。他居然知道，到共产主义要取消货币，不要钱了，不要商品贸易，取缔市场经济。资本主义靠新航路发现全球贸易，货畅其流，挣大钱。工人革命要堵住资本主义路，迈开社会主义的步，就要取消市场。

天哪，那时候我们很穷，手头很少捏拿钞票，见钱眼开，有钱是多么开心的事儿呀，好不容易熬到共产主义有钱啦，吴氏却说取消货币钞票金钱，这叫我们扎心。到共产主义，怎么反而穷得没钱了呢。我们好不容易手里有了钱，腰包鼓了，却忽然不要货币了，这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同意。可吴振明却说“取消钞票”。曲人家同学不相信，以为共产主义腰缠万贯，遍地黄金。

二人斗嘴。晚上熄灯瞎火，吴振明光着身子，也不怕冷，翻出大部头马克思的著作。他找了半天，但硬是没找出根据。不过我们还是迷信他。

这事算过去了。后来，1975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取消资产阶级法权，说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也是资本主义。原来勤劳致富就是资产阶级，没钱才会革命。我才知道，商品经济货币贸易，是罪魁。共产主义，取消货币，取缔市场，实行分配制度。货币贸易，市场交流，不好。原来，吴振明的马克思主义有水平。物质刺激，奖金挂帅，金钱哲学，真正地是资产阶级勾当。吴振明毕竟不是反革命，后来当上了苏州市特级教师。钱，古人不叫钱，叫铜臭 xiu。听说共产主义要用金子打造厕所。

这样的事儿很多。反革命右派其实是革命左派。在北师大，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好好一个人，忽然就是社会渣子。一大批老师被揪出（揪虱子一般）。整他的人大呼小叫，拍桌子打板凳。没几天，他们被解放。再后来清查“五一六”，他们有的扮演狱卒狱吏，给被隔离的“五一六”分子打饭。再往后，他们成专案组成员。再就是四人帮倒台，他们招收研究生，成博导硕导。文革积极活跃者，成三种人。淘上复淘下，浮来又浮去。

在北大扣押董连猛期间，我无聊的时候还下楼摘桃。一九七一年动乱岁月收尾，毕业，但受命抓捕“五一六”分子念《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因为顽固分子顽而不固。敌人越多越好，战士心态可以理解。但后来自己差点被抓成偷桃贼。风华正茂，在文史楼战斗间隙，辄觉无聊。那个运动就是让无所事事的人互相掐架。后来，一面革命一面偷桃——在中国，人人都是革命者爱国者，大道理琅琅上口。图书馆前，水泥塑像侧，桃李满园。李子熟了，红果压枝，叫人馋涎欲滴。有一次批斗“五一六”完毕，我和XX、XXX回餐厅吃饭，顺便偷摘李子。

我在银川搞摆拍

摆拍，不一定非是官吏不可，平民尤其热衷于此道。1973年我分配到银川市，为革命培养了一大批根红苗正的红色接班人。他们如今战斗在各条战线上。1976年，我在银川十一中参与“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教育”运动，一群穷孩子在没见过资产阶级，没看过资本主义书的情况下，批判坏书坏电影。坏文章被

批判为毒草。小说歌曲是斗争对象。《红日》《三国演义》《红岩》《野火春风》都是毒草。摆拍，那时就是寻常事。几个同学围坐在桌椅上，用手指愤怒指着一本书，假装揭露帝国主义用小说腐蚀。一块破旧的黑板上，是我用粉笔写的空心粗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坏书”。在无书可读的岁月里，书，即是坏书。

另外一个活动是建立向阳院。我和沈桂芳同街道办大叔大婶座谈如何顶住美帝苏修和平演变，把好社会主义船舵，防止祖国大船触礁。照片展在银川公园。邻居们高兴地夸我有革命热情。磕瓜籽、牛仔裤、喇叭裤、火箭头鞋、描眉敷粉，曾经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打口哨曾经也是。我在银川十一中带领学生反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内容之一是反对磕瓜籽。但随地痰是可以的。当然，戴耳环佩项链更是不可以。白球鞋、披肩发、抹口红、描细眉、喇叭裤（细腿裤），裤子有缝，是危害社会的。烫头发，那时在女学生是用什么土法把额头上流海弄出点波纹。这被认为会动摇江山社稷。学生的文体活动，是拍烟盒、跳橡皮筋、丢沙包。那岁月唯一猖獗的是城乡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在《宁夏日报》发表文章，鼓动过一个革命化春节，反对花天酒地吃喝玩乐。有人说，我们哪儿去吃喝玩乐？对我的“理论”，很不理解。

思想总结

这是我，一个知识分子的忏悔。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乐意为帝王师，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中国知识阶层，文人墨客，雄踞社会巅峰，俯视下界，一览众山，而小天下。学阀、学霸、状元，都是巨人脚踪。他们是社会主人。世界上最奇诡最犯难的是，周边左近没有一个右派。彼时也，吾们都很进步，脑子里灌输的都是讲话台词样板。哪有什么右派左倾、先进落伍、异议歧见？分歧只在于个人利害得失。攀援最先上去的人，用脚踹下去左近之人。只有把同伙打下去，才能染红自己的顶子。等待拯救的不二法门，是用脚踹下去自己的同桌同窗、同行、同龄，甚至同寝之人。

有时，人的敌人就是他自己。自以为是，故步自封，自己堵住自己前进步伐，拒绝革新，刚愎自用，对自己的成就沾沾自喜，手舞足蹈，看不到问题症结所在，这个敌人就是你的自我。而被视为不共戴天的仇人，批评挑剔挑刺规劝犯颜直谏，责怪你的人，往往其实就是你的朋友、挚友。别人超越了你，成

竞争对手、论敌，其实恰恰是朋友，畏友。《鸡鸣偶记》：“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死生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逐，昵友也；利则相攘，患则相倾，贼友也。”还有的真朋友是难友、狱友、生死与共的战友，共患难的人，才是朋友。安乐之中无朋友。

人类前行的历史，是由无数谬误、错判、失足、倒退和一系列错误、痴迷、顽劣、迷失的阶梯组成的。人类是犯错误的专家。人类最优秀者，出类拔萃者，错误也最多。不断犯错、纠偏，从而才有进步可言。历史的阶梯，是由错误、谬误的基石铺就的。参天大树的根柢，是由粪便、杂草、污泥、浊水、沃土培养基的。人类的脚踪，不是光鲜靓丽的事迹，而是丑陋的足迹。知识人、文化学者、读书写作分子更多时候是社会保守力量，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一部历史，和回忆自己走过的路一样，记载的是一系列黑暗、迷误、失足、战争、灾难和误判。历史舞台上多是令人发笑的荒诞剧。人类的困苦和眼泪多于欢快不知多少倍。历史记载的也多是荒诞、乖谬、错舛，也同样充满艰辛、苦痛、失足、跌跤、荒唐、可笑和误判。构成历史的，其实是一连串迷误。前行的路上，荆棘丛生，凹凸不平。你所谓的业绩、成果，其实是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历史，灰暗阴翳多于光彩靓丽不知多少倍。一堆毫无价值的砖块瓦砾，铺就金光大道。荒塚枯骨，构筑帝王陵寝。我们的言行，在后人眼中，多是苦痛和丑陋。功劳簿上的事迹，往往是一大堆矫饰和掩盖。❏

2020年7月10日

【文摘】

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从恶性循环到良性互动

——兼论毛泽东的皇权主义世界观

张显扬

毛泽东思想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政权在人家手里，“造反有理”，把它夺过来；政权在自己手里，“领导一切”，人莫予毒，前者是他的革命理论，后者是他的治国理念。“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毛泽东的这个自我定位，道出了

他的政治文化的实质。他从马克思那里取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以为号召；又从秦始皇那里取来皇权专制主义，作为治国理念。我们现在这个制度，就是在这样一种政治文化指导下建构起来的。这个制度建立以后，反过来又封现代政治文化，对一切民主自由思想，人性、人权和人道主义思想，宪政和法治思想，大加封杀和挾伐。相反，封腐朽的专制主义、皇权思想、国家至上、个人崇拜则大开绿灯。最后，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那种极端黑暗的蒙昧主义泛滥成灾。这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堪称制度与文化恶性循环的一个超级典型。

一、制度与文化互动的一般表现

制度与文化，历来是互动的，也就是说，历来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区别只在于是恶性循环，还是良性互动。劣质文化建构劣质制度，劣质制度助长劣质文化，这是恶性循环。优质文化建构优质制度，优质制度促进优质文化，这是良性互动。制度和文化的优劣以什么为标准？以是否符合世界主流文明为标准。当今时代，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宪政等普世价值，是主流文明。合乎这个主流文明的制度和文化的，是优质的，否则就是劣质的。

制度与文化的互动，首先表现在，一切政治制度都是在一定的政治文化指导下建构起来的。任何制度，无论是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还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才出现的党治制，即一党专政，都是人们根据一定的思想、理论、原则，自觉地建立起来的。因此，在今日中国官方话语中，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制度，是被当作“第二性”的东西的，尽管它们有相应的实体陆附属物：军队、警察、法庭等等。

制度与文化的互动，还表现在制度一经建立，就对文化的变迁产生重大影响：它为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创设一个空间，营造一种氛围。作为文化载体的知识分子，就在这个空间和氛围中生息、繁衍、想象和创造。知识分子主观上也许可以突破这个空间，在一定范围内营造另外一种氛围，但是，客观上总是受到这个制度的制约。知识分子的特殊分工，使他们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群体，他们对制度的优劣比任何其他社会群体都更加敏感，实际上也更加休戚相关。

简而言之，制度和文化的同质性、一致性。有什么样的文化，就建构什么

样的制度；有什么样的制度，就助长什么样的文化。一种制度的优劣，只要看它把什么样的文化奉为圭臬，就可以判断出来。同样，一种文化的优劣，只要看它受到什么样的制度的保护和推崇，就可以判断出来。当年，法国大文学家罗曼罗兰访问苏联，与高尔基晤谈之后，立即意识到，这位苏联文学大师生活在一个劣质的制度下面。他从哪儿看出来？从高尔基的文化心态上，从他拘谨的言谈举止上。知识分子或者说文化人，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制度的感受和态度，是喜是悲，是拥护是反对，是无法掩盖的。

说到政治改革，从发端到现在已经有近三十年历史。在此期间做了一些事情，特别是中共十三大，对政治改革作了一个虽属初步却极具开创性的规划，令人鼓舞。但是，毋庸讳言，早在1989年，政治改革就在天安门广场撞上了坦克的履带，被碾得粉碎。从此以后，再无政治改革可言。

政治改革停滞不前，可以作多方面的分析。首先是因为，执政当局担心，再改下去这个制度会失去原来的规定性，所以不准改了。其次是因为，既得利益者已经占据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要津，改革就此打住，对他们最为有利，他们不想再改了？这样来分析，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还需要剖析深层的原因。这深层的原因，就在于直到今天，社会大众尽管已经深这个制度的低劣，但对建构这个制度的劣质文化街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不能深刻洞察这个制度的本质。

中国现行的制度是根据什么样的政治文化建构起来的呢？根据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造反有理”的革命理论，帮助中共成功地夺取了政权；但是，作为建构制度的政治文化，则是一种与世界主流文明背道而驰的劣质文化。其中既没有民主法治观念，也没有分权制衡思想，而这些思想观念正是建构现代政治制度下可或缺的文化元素。抗战期间，毛泽东曾经信誓旦旦地主张过宪政，义正词严地批判过一党专政，即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然而，这一切不过是为了同蒋介石国民党作斗争，是一种权谋，一种欺世盗名的作秀，并不是他真正的文化思想，因而根本没有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殿堂。

这一点，从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决议”中专门有一章是讲“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按照邓小平关于“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要继续贯彻执

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的指示，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作了周详、仔细的概括。可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到，关于现代政治制度建设，毛有哪些思想、观点和理论。事实上，在毛思想中，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相反，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场合，毛泽东在直抒胸臆的时候，倒有许多同现代政治文化正相反对的言论，而且说得非常露骨；这些正是他的政治文化的“精髓”，是他进行制度建设的真正的指导思想。1948年9月，他就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不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这大概是中共反对议会制和三权分立的最早的版本。当然，如果往前追溯，在他们的道统中，始作俑者当数马克思，其次是列宁、斯大林。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提出的“议行合一”的主张，到了列宁、斯大林手里，就成了否定议会制和三权分立的极权体制。

实际上，按照毛泽东自己关于“国体”和“政体”的理论，把议会制和三权分立当作资产阶级的专利，也是不能成立的。什么是国体？毛泽东说：“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

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什么是政体呢？他说：“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这就是说，只有“国体”才有所谓阶级性的问题，“政体”是没有阶级性的。议会制和三权分立部属于政权的构成形式，前者是代议制的一种形式，后者旨在分权制衡。这些形式，哪个政权都可以采用。至于究竟用不用，那是你的自由。但是，决不能把议会制和三权分立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不错，议会制和三权分立，是资产阶级创造的，但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共和国这种政体，最初还是奴隶主国家的一种政权形式呢，但它并不是奴隶王阶级的专利。自古代以来，各个阶级的国家都采用过这种政权形式，资产阶级国家采用的就更加普遍了。恩格斯曾经说过，“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事实上，我们这个“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也叫“共和国”吗？而真正的共和国，是不能没有议会制和三权分立的。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

开会也是法……我们有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我们）下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这就是说，宪法、民法、刑法、规章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统统都不算数，只有“我们那一套”即党的会议和决议才算数。这是典型“以党治国”论。苏联历史学家阿夫托尔汉诺夫在《苏共野史》一书中把苏联的政治制度叫做“党治制”，其特征是共产党不仅是唯一的执政党，而且是国家本身。毛泽东的“以党治国”和苏联的“党治制”，完全是一脉相承的东西。

1941年，也就是中共假民主之名，批判国民党一党专政最热闹的时候，邓小平曾经义正词严地反对过这种“以党治国”的观念。他说：“假如说西欧共产党带有若干社会民主党的下良传统，则中国党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国民党的不良传统。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他还具体分析了“以党治国”的种种表现，其中特别说到，有些同志“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甚至有把‘党权高于一切’发展成为‘党员高于一切’者。”他说：“总之，‘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党内来。”邓小平当年对“以党治国”的批判，很有道理，但这并不妨碍他本人和毛泽东一样，是一个顽固的“以党治国”论者。

党的领导高于一切，蔑视宪法法律；大权独揽，否定分权制衡；只要民主集中制，不要民主制。这就是毛泽东政治文化的三个相互联系的要点。整个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政权在人家手里，“造反有理”，把它夺过来；政权在自己手里，“领导一切”，人莫予毒。前者是他的革命理论，后者是他的治国理念。

二、“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毛泽东和现代政治文化格格不入，这和他的整个世界观分不开。皇权主义便是他的世界观的核心。“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多次毛泽东在谈到自己时这样说。这并不是开玩笑，随便说说的。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曾戏问他的俄

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按书本知识说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哈哈大笑说：“其实是一样的！”总统和皇帝是一样的，共产党的主席和皇帝也是一样的。1972年，毛泽东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两人谈得兴起，尼克松问毛泽东，你是否认为你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继承人、毛泽东毫不迟疑，冲口以英语“Certainly（当然）”作答。这给尼克松留下深刻印象。在出版《尼克松回忆录》中文版时，把这个情节删掉了”

毛泽东以皇帝自居，是不加掩饰的。他外出视察回京，往往会说，这次出去会见“各路诸侯”云云。没有皇帝，哪来“诸侯”？既然共产党的主席和皇帝是一样的，皇帝要喊万岁，共产党的主席当然也要喊万岁。1950年月，中宣部起草的“五一”节口号中，最后有两条“万岁”：一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一条是“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笔加上“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扯着嗓子，如痴如狂地喊了几十年的“毛主席万岁”，竟然是毛泽东自己要大家喊的，真是不可思议！皇权主义是他君临天下，显示权威，获得心理上最大满足的思想上精神上的根基。“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毛泽东的这个自我定位，比任何鸿篇巨著都更加精准地道出了他的政治文化、他的整个世界观的实质的确，马克思和秦始皇，构成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表里。他从马克思（主要是列宁）那里取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以为政治号召，又从秦始皇那里取来皇权专制主义，作为治国理念。正如他自己所说，“百代皆行秦政制”。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就是在这样一种从古到今一脉相承的政治文化指导下建构起来的。这个制度建立以后，反过来又对现代政治文化，对一切民主自由思想，人性、人性和人道主义思想，宪政和法治思想，大加封杀和挾伐。相反，对腐朽的专制主义、皇权思想、国家至上、个人崇拜则大开绿灯。最后，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那种极端黑暗的蒙昧主义泛滥成灾。这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堪称制度与文化恶性循环的一个超级典型。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带着江西那段生活的痛苦记忆，历数这个制度的种种“弊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邓小平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他历数了这一切，却没有用中国人很熟悉但又有很大刺激性的概念去加以概括。实际上，这一切所谓“弊端”，不正是秦始皇以来绵沿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所固有的本质特徵

吗？然而，为了进行改革，他又不得不把这个制度的核心人物毛泽东本人的错误和制度问题联系起来。他说：“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又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中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邓小平说的“制度问题”，只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领导制度”问题，而不是根本政治制度问题。实际上，正是这个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而不是他所说的那些制度，几十年来平添了那么多政治运动，使国家民族蒙受了那么多灾难，那么多人受到批判、斗争，那么多人死于非命。邓小平尽管接触到了“制度问题”，但是，大权在握以后，这个“制度问题”又成了制度的“优越性”：它决策快，效率高，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当然，最主要的“优越性”，他没有说，那就是可保政权永远掌握在共产党手里。

三、政治改革必须与批判劣质文化同步

既然这个制度是那样一种政治文化的产物，那么，要改革这个制度，就必须批判这种政治文化。改革之初，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因为那时候比较注重对这种劣质文化的批判，当时叫做“拨乱反正”。主要批判了“两个凡是”：“两个凡是”同把皇上的话当作“金口玉言”，不许稍有违反，是一样的意思。批判了“全面专政”：“全面专政”，就是没有民主的一党专政。批判了“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其实就是皇权专制主义。还批判了其他种种与这个制度的劣质内涵有关的思想观念，诸如“一言堂”“长官意志”“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等等。正是在这些批判的推动下，政治改革才得以向前迈出了几步。但是，很快就转向了。批判专制主义，提倡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

等现代政治文化，被当作“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连人带马遭到整肃，结果也就无所谓政治改革了。

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政治改革，必须与批判劣质文化同步。拒绝或反对批判劣质文化，就是拒绝或反对政治改革。今天，政治改革之所以止步不前，就因为对这种劣质文化及其造成的恶果，不但不许再批判，反而把它们当宝贝供起来。如果想重新启动尘封多年的政治改革，那就必须重新展开批判劣质文化的斗争。这里我不由得想起已故李慎之先生，他对专制主义的抨击不遗余力。不批判文化传统中的专制主义，而像现在这样，甚至把中国专制主义的鼻祖秦始皇，也当作英雄来歌颂，怎么能肃清它的流毒呢？此外，还应该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列宁的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理论，毛泽东的皇权主义，以及被高高地置于思想史神坛上的历史唯物论，等等，进行认真的梳理和批判。只有这样，才可以把政治改革推向前进，同时，也才可以重构一个现代的政治文化。■

【读者来信】

1. 梁幼志：希望看到更多的高校文革资料选

文革时，中国有五百多所高等院校，北京就有59所。高校是文革折腾最严重的地方。五十年后，只有两所高校有本校的文革史料选编：徐振保编选的《复旦大学大学报选》上下册。胡宗式、章铎编的《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三册）。

这两种资料选有几个不同，首先是内容的不同。复旦的仅限于当时的大字报，北大的不但有大字报，还有小报、会议发言、首长讲话等。其次是篇幅不同，复旦的六十万字，北大的一百二十万字。第三是编者的专业不同。徐振保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四年级的学生，而胡宗式、章铎则是理科生。第四是资金来源不同。复旦是学术机构联手（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与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合作项目，有教授的指导，有博士的协助，更重要的是，有官方的专项资金支持。北大的则是胡宗式、章铎二人自己搜集资料，自编自选自校，自己联系出版。而出版费用是由几个校友掏腰包。最后一个不同，复旦的2013年在国内印刷，没有书号。只能在国内小范围内传播。北大的2020年在国外出版，有国际通用书号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编目号，通过LULU网和谷歌平台，走向了世界。

在今天的语境之下，复旦的模式已成绝响，北大的模式不幸成了必选。无论是何种模式，人家总是在做事，总是在为文化做积累。五百多所高校，每所学校都有几千名毕业生，几千名文革的亲历者，于中应有一个半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人。希望其中总能出现几位徐振保、胡宗式、章铎这样的人物。

2. 刘进纠错

284期 有两处误植：

1) 第9页，倒2行：这一波上“荣誉校友”事件导致的中外抗议，下启陈宋道歉引发的舆论大潮，…… ——应该是“上承”，少了“承”字

2) 第12页，王本中应该是北师大实验中学前校长（女附中时期，他是数学组教师，65年提成数学组副组长）

3. 蒋健、何蜀纠错

目录和5页上的“八一五”应为“八五”。

4. 张晓良正误

目录页《云南文革史》（下卷），内容简介漏排：第三卷 谭甫仁时代。

第27页倒数3行，花间一壶酒，应为：花间一壶酒。

第55第7行 我省委办公厅做秘书时——我在省委办公厅做秘书时。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2008年9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老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着

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